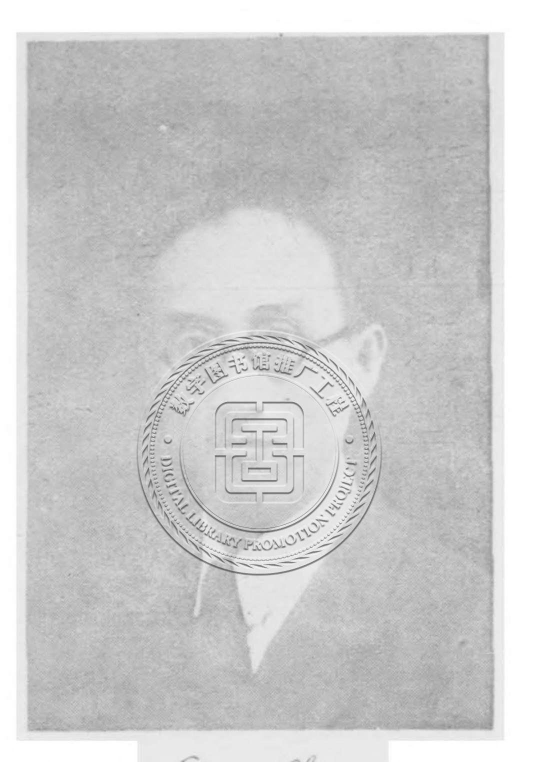



患難餘生記
靜農





（一九二八年）

本書原稿之一頁



韜奮先生病中與家屬合影

（一九四三年七月攝於醫院）


居住證

姓名 李晉卿 (性別) 男

年齡 五一才

住址 菜市橋三三號

職業 百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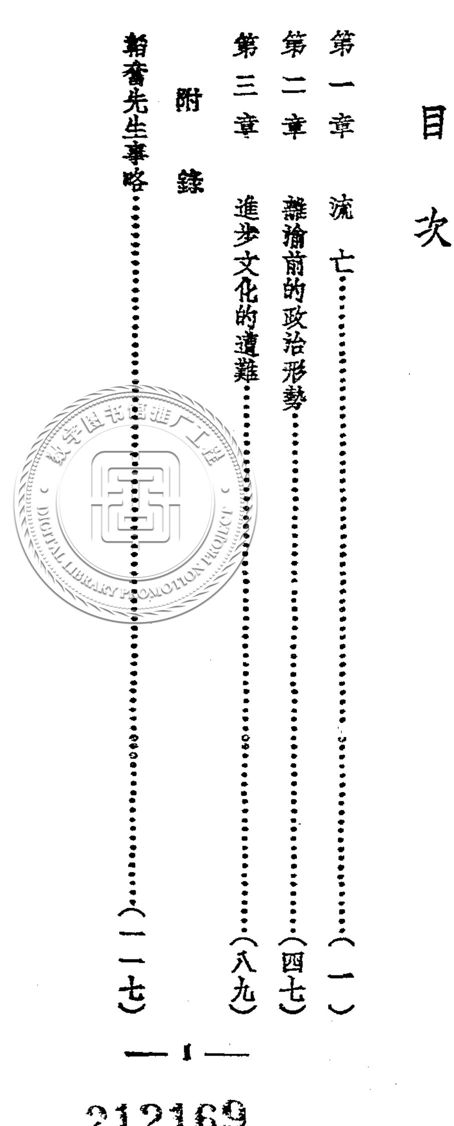
填寫機關

中華民國 三三年十一月五日

右食指　左食指

居住於敵僞魔掌下用以掩蔽之證件

目次



第一章 流亡

這本書是在流亡的病苦中寫的，所以我首先想略談流亡。

我這個人就表面上看來，好像是很富於流動性似的，好像是很好動似的。第一次流亡在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從上海做出發點，由大西洋流動出去，於一九三五年由太平洋流動回來，在地球上剛剛環繞一周，流動了這麼大的一個大圈子！隨後十年來，除和幾位救國會的同志在蘇州路嘗鐵窗風味不能算流亡外，有第二次流亡，第三次流亡，第四次流亡，第五次流亡，第六次流亡！好像我樂此不疲似的！流亡包含流動，在實際上我很怕流動。

我怕流動，倒不是因爲我懶惰。

第一因爲我的職務關係。我差不多出了學校就踏上編輯之路，編輯刊物的出版是有定期的，而在中國這樣的艱苦環境裏，眞正認眞辦事的機關往往事多人少，不易離開職

守。我雖怕流動，在職務上需要流動的時候，也只得流動流動。例如初期在中華職業教育社擔任職業指導股主任的時候，（當時該社主任黃任之先生，主任之下分股辦事，我不久即改任編輯股主任，主持教育與職業月刊，職業教育叢書，後來專辦生活週刊）就爲着職業指導運動，偕同楊衞玉先生（當時任該社副主任）跑了十來省的路，不過比較都是短程，而且是交通便利的區域。

第二因爲我有暈船暈車的毛病。這種毛病雖不算很利害，但有時卻也夠麻煩。在中華職業教育社任事時，有時因該社在南京開年會，有時因演講（當時東南大學的暑期學校每設有職業教育組，請職教社同人任講師），我臨時由火車偕任之先生於晚間趕往南京。當時由上海往南京，乘夜車是最經濟的辦法，夜裏十一點鐘開車，第二日晨六七點鐘便到。但是因爲我們乘的是二等車，四人對坐，中間一小几，不得躺下去睡覺，有時同座雖偶然空個位置，灣曲而臥，也勉强得很。以有暈車習慣而又不慣熬夜的我，每經這樣一夜，便不免頭昏腦脹，精疲力盡。我當時實在敬羨老前輩任之先生那樣的精力。我在車裏夜眼矇矓中總看見他常常從衣袋裏挖出厚厚一本的活頁日記簿子，用自來水筆在那上面寫這樣寫那樣，打瞌睡的時候很少。黃先生那個時候是社會上的忙人，他的什

麼計劃，什麼演詞要旨，大概就在這種時候寫下的。黎明車子到了南京，我拖着疲乏不堪的身體隨他下車，好像生病初愈似的，但是他老先生卻精神抖擻，步履如飛，總走在我的前面。依理我這後輩在旅途中應該照顧他老，但是在實際上卻反過來，叫黃包車，講車錢，都是由他老一手包辦，布置妥貼之後，我安然坐上車子隨他進城。

其實就中國一般情形說來，交通不便，設備欠周，也是使人怕動的一個重要原因。所以中國有句老話，說是「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朝難」。有些洋氣十足的朋友，每易破口就罵中國人不知道旅行的益處，不能像外國人那樣喜歡旅行，增廣見聞，增加知識，甚至認爲這也是中國人的一種劣根性，與什麼「民族性」有關，他們根本就沒有顧到中國人所處的是什麼環境。我在國外走了一遭之後，更覺得這種責備是含有莫白之冤。以我這樣怕動的人，在國外的時候卻也喜動，就是環境給與他以動的種種便利。

我在國內雖怕流動，但是爲職務上所需要時卻也不辭跋涉，至於萬不得已而不得不流亡，那更含有比較重要的意義，和尋常職務上所需要的流動不能相提並論的了。請談我的第一次流亡。

第一次流亡，一方面是由於生活週刊的力量突飛猛進；一方面是由於參加蔡子民先生和孫夫人所倡導的民權保障同盟。

關於生活週刊的始末詳情，我在經歷及事業管理與職業修養兩書中都曾述及，在這裏不想多說。簡單說起來，該刊最初是由中華職業教育社所創辦—旨在宣揚職業指導和職業修養，後來由於時代的需要和內容的進步，漸漸推廣到實際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在九一八事變以後，對於民族解放的倡導及不抵抗主義的嚴厲攻擊尤不遺餘力，超出最初創辦者所規定的宗旨，有獨立經營的必要。可感謝的是中華職業教育社諸先生慨然允許其獨立，由生活週刊社全體同人組織合作社，獨立續辦，後來成為進步文化一支強有力的生力軍的生活書店，即濫觴於此。

當時生活週刊風行海內外，聲勢日大，不僅在交通比較便利的城市可以隨處見到，即在內地鄉村僻壤及遠在異域的華僑所在地，也隨處可以見到。最有趣的是不但承蒙許多熱心讀者自動介紹訂戶，而且訂戶還有傳代的，父親歸天，兒子還要接下去！

當時的生活雖在這樣蓬勃洶湧形勢之下，在實際上每期銷數也不過十五萬份。這個數量在外國出版事業發達的地方，可謂渺乎其小，但在中國卻好像已屬驚人。當時有女

作家蘇雪林女士把這個事實向胡適之先生提及，胡先生不信說據出版界邵某說，生活每期不過二萬份而已，認為無足重視。其實事實勝雄辯，不值得爭辯，事實上當時因紙張貼本太重，一部分要靠廣告收入貼補，為增強廣告戶的信任起見，我們曾將郵局立券寄遞的證件及報販收據製版印出證明。生活週刊共辦了八年，當時的政府如與胡適之先生有着同樣的意見，它的生命也許還可以長些，不幸生活卻被他們重視起來，生活出到第六年的時候，就被下令禁止郵遞。

本埠——上海——銷售只是佔全部一小部分，最大部分是要由郵局寄往外埠的，所以禁止郵遞當然是刊物銷路上一種嚴重的打擊。怎麼辦呢？當時生活自問對於政府只有在政策上批評的態度，並沒有反政府的態度，所以首先從解釋誤會下手，由國民黨的黨國元老，向來關心文化事業的蔡孑民先生兩次致電當局解釋，當局兩次回電拒絕，咬定要禁止郵遞，蔡先生雖非常和我們表同情，也無可如何。我們還在無辦法之中想辦法。任之先生認識黃膺白先生（郛），乘他往見某先生之便，托他代為疏通，某先生拿出一厚本合訂起來的生活週刊，那上面把批評政府的地方都用紅筆劃了出來，他認為批評政府就是反對政府，所以絕對沒有商量之餘地。這樣看來，郵遞這條路是要斷絕了，刊物

也就不免壽終正寢了！

但是一方面由於讀者羣衆同情心和協助力量的偉大，一方面由於當時所謂特務工作還不及現今的猖獗——尤其是對於文化事業，郵局寄遞雖受了無理的禁止，但是交通機關，如鐵路，輪船，民航等等地方，隨處都有同情熱心協助的讀者幫忙，一大捆一大包地運輸出去，銷路不但不因此減低，反而經常增加起來，並且延展了兩年的生命，直至我出國之後若干時後才被封閉。（封閉之後，摯友杜重遠先生接着辦新生週刊）

且說生活週刊雖在禁郵的情況下保持着它的英勇公正邁進的態度，但是在當時卽站在團結抗戰民主運動的最前線，愈益受到當道的嫉視，無甯說是意中事。

眞有生命力的刊物，和當前時代的進步運動是不能脫節的。但是由於環境的壓迫，它的艱危的程度也往往隨着增加。

火上添油，如上所說，我一面又參加了蔡孑民先生和孫夫人所倡導的民權保障同盟。

提起那時的民權保障同盟，也可以說是民主政治的一種枝流初步運動。民主政治不能離開民權，說到民權，除了選舉權罷免權等等如中山先生所謂四權之外，最主要的大

家都知道而且常常聽到的是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權和生命的自由權，而人民生命的自由權，尤爲基本的基本，因爲生命的自由權如果得不到合法的保障，什麼都無從說起。因此，各國憲法對此都有明確的規定。卽就中國說，僅有的基本法如臨時約法，以及刑法，都規定捕人罰人必須經過法律的手續，卽由公安或警察機關拘捕，也必須於二十四小時以內送交法院依法處理。此外如公開審判，律師依法辯護等等，都是防備違法殘害人民生命的必要手續，在法律上也都有明文規定的。

但是在蔡孑民先生和孫夫人等發起民權保障同盟的時候，所謂特務已經橫行，他們避開法院和法律，用綁票方法祕密捕人，酷刑逼供，慘無人道，隨意處死，有寃莫伸。在這種無法無天的黑暗情況之下，有用的人材和無辜的青年被犧牲的不知多少！我還記得當時有一位很友好的南洋大學同學，他有一個親戚是一個年才十八歲的優秀青年，而且是個獨子，他的寡母就只有這一個獨一無二的愛子，不幸被特務綁去，硬說他是共產黨，但毫無證據。他的母親哭得滿地打滾，求援於我的這位同學。當時特務大權握在CC派手裏。我的同學和該特務工作主持人亦有同學之誼，便挺身而去，力爲擔保。答覆說可以釋放，不過必須寫一張悔過書。那個孩子卻是一個有骨氣的硬漢，他說無過

可悔，不肯寫什麼勞什子的悔過書。結果他終於不明不白地被無辜搶決了，他的母親雖呼天嗆地，哭得死去活來，何濟於事！我的這位同學原是一位和平中正的好好先生，也氣得切齒痛恨，怒髮衝冠，但亦何濟於事！這只是我所親自看到聽到的一個小小例子。類此例子，比這例子更慘酷萬倍的，更不知有盤千盤萬，不可勝數！

民權保障同盟便在這種慘況之下產生。特務的違法橫行，草菅人命，用綁票的方法，用秘刑的拷打，都是在偷偷摸摸鬼鬼祟祟中進行的，（後來在內地發生「失踪」的新鮮名詞，當時這種名詞還未曾發明！）民權保障同盟就是要揭發這類黑暗的違法行爲，依法加以援救。

蔡子民先生負黨國重望，對於構成國家民族奠基石的優秀青年及人材尤愛護不遺餘力。孫夫人向來主持正義，國際聞名。由他們兩位出任正副會長，該同盟的力量更爲增加，在國際宣傳上也更爲有力。當時中國特務要在上海租界捕人，不得不勾結租界當局，英美的政治雖也不見得怎樣高明，但對於法治二字，總比CC派的特務重視一些，所以他們的黑暗技倆或事實經民權保障同盟揭露之後，對於他們多少也要增加些麻煩。此外該同盟也時常根據事實，直接向有關當局交涉。尋常老百姓如向他們哀求探問，他

們可以厚着臉皮回答根本不知道有這回事，根本不知道有這樣的人，你又將他們奈何！可是由黨國元老主持的該同盟，根據事實提出交涉，卻不能像對尋常老百姓那樣易於對付了。

這種情形在當時南京當局方面，有一部分人當然滿不高興。他們雖然膽大妄爲，但對於黨國元老如蔡孫，究竟不敢遽下毒手，於是決定先從該同盟總幹事楊杏佛先生下手。

當時民權保障同盟總會在上海，開會時總是和上海分會開聯席會議。每次參加者有蔡先生，孫夫人她的英文祕書史默得萊女士，魯迅、林語堂、楊杏佛、胡愈之諸先生，我也忝陪末座。每次開會總是由蔡先生主席。因爲有西人參加（還有一位是西報記者，忘其名），中文文件每由林先生當場譯成英文，譯得很恰當。開會時最有趣的是魯迅先生和胡愈之先生的吸紙煙。他們兩位吸紙煙都用不着火柴，一根剛完，卽有一根接上，繼續不斷地接下去。

楊杏佛先生是總幹事，決議案的執行當然偏重在他，他又很熱心幹事，所以會務的進行很積極。楊先生平日的私人行爲，也許不盡滿人意，但是他爲保障民權努力，爲保

障民權運動而犧牲了他自己的生命，就這一點說，他的死是值得永遠紀念的。

他在事前得到警告，隨着事變發生。他有一天剛和他的十一歲的兒子小佛上汽車，暗殺他的鎗彈四面飛來，他用全身包圍着他的兒子以衞護他，結果他的兒子幸得保全生命，而他自己卻被亂彈所犧牲了。

隨着謠言四起，有幾種『黑單』的傳說，鄙人也蒙他們青睞，列名其中。

楊先生死後，送往萬國殯儀館大殮，當時人心浮動，弔者寥寥，不過數十人而已。我和胡愈之先生以楊先生為公而死，殊可欽敬，相約同時借往靈前致敬，表示哀誠。到時他正在入棺，當時他已和他的夫人分居（似已離婚），只聽見他有個胞妹在慘呼大哥，悲泣甚哀，令人悽然。

經過這場風波之後，文化界有幾位特別愛護我的好友勸我出國暫避，於是開始我的第一次流亡。

出國不是一句空話所辦得到的，必須有相當的經費。幸而有幾位好友在國內拍胸膛，先籌集三千元，叫我帶着先走，隨後他們再設法借款接濟。我在國外便就視察所及，努力寫書，以作報償。

第一次流亡算是我幾次流亡中最安適的一次，因爲中國人往歐美旅行或視察，不管你有錢沒有錢，都必須勉強撐着相當的場面，例如乘輪船至少必須乘二等艙，否則上岸時便要發生許多麻煩，往美國甚至要被關在什麽島上的拘留所裏，好像鋃鐺入獄一樣！在各國視察研究，各處奔走，雖然也是很辛苦的事情，但是由於環境的相當舒適，交通比較便利，求知的機會尤其易得，這都是令人追想而不勝其依戀的。但是我在當時非被逼迫至萬不得已，也不會有出國之行。

附帶有一件小事使我感到奇趣。我於一九三三年出國，一九三五年五六月間旅行到美國西北部達科他州 Dakota 在那裏經過一個小城市，看到本地當天一份日報上的社論題目，赫然爲中國民權保障的良好模範！開首除說明民權在一個共和國裏的重要性外，即十分讚揚中國有個民權保障同盟，說中國允許有這樣的一個機構存在並允許其活動，眞不愧稱爲中華民國！接着便替在時間上爲共和先進國的美利堅合衆國大感其慚愧，極力建議應該以中華民國的民權保障同盟爲良好模範，也來組織一個民權保障同盟。我看完了這篇社論，一面爲中國榮幸，因爲得到那樣的讚揚，同時卻又笑不可仰，深深覺得慚愧，因爲我知道在中國的民權是在遭受着怎樣的摧殘！該報的主筆先生大概只聽到中

國民權保障同盟歷史的前半段！倘若他知道了後半段的歷史，也許要感慨系之，不再那樣捧場了。

關於第一次流亡中視察及研究所得，我曾經著有萍踪寄語第一集（偏重在寫英國）；第二集（偏重寫德國）；及第三集（全部寫蘇聯）。此外還有萍踪憶語，（全部寫美國），是回國後在蘇州看守所中完成的。全部寫蘇聯的萍踪寄語第三集和全部寫美國的萍踪憶語，都近二十萬言，所搜集的材料較爲豐富，而且都是親自視察到的。周恩來先生有一次偶然和我提及萍踪憶語，他說關於美國的全貌，從來不曾看過有比這本書所搜集材料之親切有味和內容豐富的。這雖承他過獎，但在當時爲着搜集著述材料，不以視察美國東部爲滿足，特冒着相當的險往美國南部一行。（尋常的旅行原沒有什麽危險，但美國南部反動勢力相當大，要去實際探訪，搜集眞實材料，卻有相當的危險）。除東部南部外，還往北部西部視察，不但視察城市，而且深入鄉村，所以自問是很費了一番苦工的。

上面說過的四本書，算是我第一次流亡對於讀者諸友略盡報告的職責，在這裏不想有所贅述了。

現請略述第二次流亡的前因後果。

我在上面提及過，我出國後生活週刊即被封閉，摯友杜重遠先生即接着創辦新生週刊，在精神上是和生活一致的。這好像我手上撐着的火炬被迫放下，同時即有一位好友不畏環境的艱苦而搶前一步，重新把這火炬撐着，繼續在黑暗中燃着向前邁進。我在海外聽到這個消息，眞是喜而不寐，我從心坎裏深深感謝杜先生。但是我於一九三五年五六月間在美國旅行到芝加哥時，突然在芝加哥最著名的論壇報上看到長電，詳載「新生事件」的發生及杜先生含冤入獄的情形，初則爲之驚愕，繼則爲之神傷，珠淚奪眶而出，恨不能立生雙翼飛至獄中抱着杜先生向他極力安慰一番。

杜先生的愛國文字獄加速了我的歸程。我於當年八月間回到上海，一到碼頭，別的事都來不及聞問，第一件事即將行李交與家人之外，火速乘一輛汽車奔往杜先生獄中去見他。剛踏進他的門檻，已不勝其悲感，兩行熱淚往下直滾，話在喉裏都不大說得出來！我受他這樣感動，倒不是僅由於我們友誼的篤厚，卻是由於他的爲公衆犧牲的精神。

杜先生身在獄裏，他所創辦的新生也夭折了，我於是籌劃創辦大衆生活週刊。當時是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五周年，華北五省等於繼着東四省而送卻，而來日大難，方興未已救國運動和妥協陰謀兩方面的鬥爭日趨尖銳；另一說法，也就是停止內戰以團結抗戰的主張和甯願妥協不願停止內戰的成見，這兩方面的鬥爭也日趨尖銳。愛國的熱火在每一角落裏每一個愛國同胞的心坎裏燃燒着，當局雖盡力壓抑，亦有難於禁止之勢。大衆生活便在這樣形勢之下，接着新生而撐起光芒萬丈的火炬，作爲愛國者的代言人和計劃者。——它的產生正在震動寰宇的一二九學生救國運動和全國澎湃，沛然莫之能禦的如火如荼的救亡運動的前夕。

大衆生活每期銷數達二十萬份，打破中國雜誌界的紀錄，風行全國，爲每一個愛國青年所愛護，爲每一個妥協陰謀者所震慴不是偶然的，因爲它是與當前時代最進步的運動——救亡運動——聯結在一起的。參加救亡運動的重要作家和熱心青年，他們的重要著作都在這個刊物上發表；這個代表時代性的刊物，它的內容是和當前時代的進步主潮息息相關，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

但是當時上海許多朋友及各界愛國人士接着一二九學生救國運動所迅速形成的風靡

全國的救亡運動的核心，是和當時政府的所謂「睦鄰政策」處於矛盾的地位。在政治比較上軌道的國家，民間的愛國運動，原可作為政府外交的後盾。但在中國則情形往往相反。他們不把民間的愛國運動視為是對外來侵略者的敵愾同仇，卻視為是反對政府！當時政府中有些人老實主張妥協投降，有些人則表面上雖不敢直接主張妥協投降，但卻藉口「準備」，高嚷「先安內後攘外」！救亡運動者對於直接主張妥協投降者固然給以迎頭痛擊，對於「準備」論者，認為要真正迅速準備保衛國土，必須立即停止內戰，全國團結，一致對外，這樣才是真正安內。倘若繼續內戰以「安內」，那結果還是要走上妥協投降同一道路。這種說法，在今天看來，更是顯明得很，七八年來的團結抗戰給與了這種理論以鐵的證明，雖則還有一些民族敗類仍在時時發生破壞團結的陰謀。但在當時這種主張卻被當道視為大逆不道！

當時上海成為在實際上領導全國救亡運動的中心，而在南京的當局，據說對於這個「中心」地點，最注意兩個東西：一個是李公樸先生所辦的擁有五千愛國青年學生的一個補習學校；還有一個便是被證實了每期有着二十萬份銷路的大衆生活週刊。那個補習

學校的愛國青年是當時上海民衆運動一支強有力的生力軍，使該校成爲民衆運動的一個大本營，所處地點雖屬上海一隅，而上海的民衆運動所發生的影響是要遍及全國的。至於大衆生活，那更不限於上海一隅，是在海內外不徑而走的。

於是當局注意到李公樸先生和我。說來此中還有着一段有趣的經過。南京方面派了兩個人來和我談話：一個是據說現在因私人粉紅色事件灰心去做和尚的L先生；還有一個是最近新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C先生。他們兩位我原來都不認識，由上海出版界一位朋友邵洵美先生作介紹人，卽約在一個晚間在邵先生的家裏談話。

我本來胸懷坦白，主張光明，無事不可與人公開談談。邵先生作調人的好意，盛意尤不便辜負。我在一個晚間晚飯後應約到邵家，邵先生和LC二氏都已先在，我們在客客氣氣的氣氛中開始談話。聽說C先生以前是在法國學藝術（油畫）的，他很會說話，而且說得很多，他一個人就說了三小時之久，我靜心傾聽，始終不得要領，倒是L先生說話容易懂而饒有奇趣。他當時是××社的總書記，據說中國法西斯的組織章程，就是他根據意大利藍衣黨的模型而起草的。他那時剃着光頭，兩個眼睛圓圓大大的，說話的聲音很宏亮。他說的話也不少，關於抗戰問題，他發揮了一大篇「領袖腦殼論」。中國

的國土在繼續內戰和不抵抗主義的情形下一天天縮小，是否應該立即停止內戰，團結全國一致禦侮呢？簡單問一句，中國應否抗戰？如那時還不應抗戰，到了什麼時代才應抗戰？這些問題，在Ｌ和尚看來很簡單，全憑領袖的腦壳去決定，他說一切都在領袖腦壳之中，領袖的腦壳要怎樣就應該怎樣！我們（指全國人，Ｌ和尚當然也包括在內）一切不必問，也不該問，只要隨着領袖的腦壳走，你可以萬無一失！

他聲如洪鐘似地侃侃而談，發揮這種妙論，津津有味，我當時微笑傾聽，覺得眞是聞所未聞，聽到了千古奇談！看到他那樣天眞，感到一種奇趣。不，他還有奇談汩汩而出。他說領袖的腦壳，自有妙算！你們言論界如果不絕對服從，還要呶呶不休的話，那好像領袖要靜靜地睡覺，你們這些像蚊子嗡嗡在周圍煩擾不休，使他是忍無可忍，只有一揮手把這些蚊子完全撲滅，你看他多麼天眞有趣，把全國的救亡運動和救國輿論，輕輕加上「蚊子嗡嗡」，只要「一揮手」就可以「完全撲滅」，我聽到這種有趣的奇談，除由微笑失聲狂笑之外，尋不出其他的落場。他見我只是笑，也許以爲我已心悅誠服了，更肅然逼緊一步對我宣稱：「老實說，今日殺一個×××，絕對不會發生什麼問題，將來等到領袖的腦壳妙用一發生效果，什麼國家大事都一概解決，那時看來，今日

被殺的×××不過白死而已！」

他把死來恫嚇我，但卻說得那樣有趣！這不能不使我繼續地笑。我說救亡運動是全國愛國民衆的共同要求，絕對不是一二人或少數人的「腦殼」所能創造或揑造出來的，所以卽令消滅一二「腦殼」——這裏指的當然是無辜民衆的「腦殼」，不是L和尙所說的神聖不可侵犯的領袖的「腦殼」，大有合併聲明之必要——整個救亡運動還是要繼續下去，非至完全勝利不會停止，這希望他們了解者一。同時附帶對他聲明，不參加救亡運動則已，旣參加救亡運動，必盡力站在最前線，個人生死早置度外：這是對於他的以死恫嚇作簡單乾脆的答覆。民間的愛國運動，儘可被作爲政府的外交後盾，不必卽視爲反政府的行爲，這是希望他們了解者二。政府旣有決心保衞國土，卽須停止內戰，團結全國一致禦侮，否則高喫準備，實屬南轅而北轍，這是希望他們了解者三。我們希望蔣先生領導全國抗戰，成爲民族領袖，對領袖當然尊重，但對於L先生所主張的「領袖腦殼論」卻不敢苟同，因爲領袖的偉大處正在能集衆「腦殼」的大成，而不在消滅衆「腦殼」或無視衆「腦殼」而成爲「孤家寡人」，這希望他們了解者四。

於是談了許久，差不多到了晚間一二點鐘，邵先生雖也在座，他是處於調人和招待

客人的地位，只是時時微笑地靜默着抽他的香煙，說話最多的當然是LC兩位，我也是只是扼要地貢獻一些上述的意見。我們都始終客客氣氣，沒有面紅耳赤過，雖則L先生一說起「領袖腦殼」，就兩個眼睛圓睜得特別大，聲音特別宏亮，好像特別興奮似的。時間談得太晚了，我起立告辭，叫了一輛野雞汽車，奔馳回寓。上車之後，我獨自一人在車裏失聲而笑，因爲好像在做夢，又好像看了一齣什麼喜劇！南京既叫他們兩位跑到上海來和我談話或談判，何以既沒有什麼重要的有關題目的話提出來談，一則語無倫次，一則妙論橫生，最後即一鬨而散，毫無結果可言，眞是令人摸不着頭腦。（雖則大家都有一個「腦殼」！）。

但是讀者諸友不要以爲我在說笑話，因爲仔細想想，L先生的「領袖腦殼論」雖然說得奇突，直至現在，國民黨中有一部分人還是把這樣的態度來「尊重」他們的領袖。他們提倡對於領袖的絕對服從。有人說在蔣先生左右很不易找出卓越的英才，這話對不對是另一問題，倘若有幾分意義的話，毛病就在上述的「領袖腦殼論」，雖則國民黨中其他人物也許不會像L先生說得那樣天眞直率。

這種領袖觀便是獨裁的領袖觀和民主的領袖觀的根本差異。民主的領袖觀是要領袖

採取衆長，重視民衆「腦壳」，卽重視民衆的要求和輿論的表現；獨裁的領袖觀便恰恰相反，只有領袖算有「腦壳」，其餘千億萬的民衆算是等於沒有「腦壳」！前者需要眞正的民意機關，民意機關便是最優秀的民衆「腦壳」的聚集所；後者便厭惡民意機關，因爲聚集他們所忽視的民衆「腦壳」於一堂，不但沒有什麽意思，而且他認爲還要妨礙他的獨裁。

這也許就是法西斯主義的領袖觀。不久以前在報上看到德國宣傳部長戈貝爾對德國人民演講，有幾句妙語，他說：「我們只要看看領袖（指希特勒）的面孔，便知道他是悲天憫人，志在拯救世界，」（原文不在手邊，大意如此）我看到這幾句話，也不免失聲而笑。怎樣的面孔才是「悲天憫人」，又能「志在拯救世界」？是不是哭喪着臉的面孔，講到老希的面孔，有人說他具有一副流氓面孔！流氓和「悲天憫人」云云，相去更遠了。美國的電影明星卓別麟惡作劇，在他傑作的「獨裁者」一片裏，把老希的面孔造成一個小丑的面孔，小丑的「悲天憫人」至多是假的吧！但是無論如何，在法西斯主義者看來，他們領袖的面孔總是與衆不同，在面孔上就含有「悲天憫人」而又「志在拯救世界」！這可稱爲「領袖面孔論」。不過戈貝爾博士還未曾進一步指出只許領袖有面

孔，其他的人就應該一概不要臉罷了！

其實盲從領袖的面孔也罷，盲從領袖的腦殼也罷，盲目的服從究竟不及理智的服從。卽就L先生而論，聽說他因為私人粉紅色事件，被他的太太在蔣先生面前哭訴一番，蔣先生聽了之後，把L先生叫到面前大罵一頓，L先生大為心灰意冷，法西斯的氣概頓然消失，披髮入山去做和尚去了。這段故事如果確實，可見L先生對於領袖「腦殼」的信仰還不能夠堅決，亦可見盲目的信仰究竟比不上理智的信仰。

話說得遠了，閒話少說，言歸正傳。且說L、C兩位回到南京之後，對於我的報告也許還不算很壞，因為接着得到消息，知道蔣先生有意約我往南京和他當面一談。由杜月笙先生出面表示，他願意親自陪送我往南京見蔣先生，並於晤談後親自陪送我回上海。這是出於杜先生的一番好意。當時上海有個地方協會，是由上海工商界鉅子所組織的，杜先生是該會的重要份子，（好像就是該會會長已記不淸）祕書長是任之先生。我由任之先生的介紹而認識杜先生。當時杜先生在上海社會上的勢力是衆所週知的，同時又是蔣先生最親信的一人，有許多職業界的朋友覺得由他出來保證安全是再靠得住沒

有，都贊成我往南京一行。杜先生很豪爽地拍胸脯說道：「有我杜某陪你同往，又陪你回來，安全絕對沒有問題。」他一面這樣說，一面卽電南京接洽好日期，南京方面戴笠奉命於某日親到火車站來接我們。

我當時是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執行委員之一，所以除我自己考慮之外，還要徵求救國會的幾位同志的意見，因此在未決定以前，對於杜先生之約一時未置可否。在討論期間，當然有不同的意見，有些同志估計不致有何意外（指扣留之類），儘可赴甯一談。有些同志卻認爲不妥，關於救亡運動的態度既不能隨便遷就，卽有意外的可能。經過大家兩次會議討論之後，決定不去。

我把不去的決議告訴杜先生的時候，知道他所約的日期卽在翌日淸晨，當晚卽須乘火車赴甯，對於我的不去，很不痛快，認爲是失約。當天下午在中匯大樓（杜先生的辦公處）和杜先生談話的時候，在座的還有一位老資格的銀行家，他和蔣先生很接近，平日對我也很有好感，聽到我的決議，很誠懇地不慌不忙地對我說道：「你這次要不往南京一行，就只有再流亡海外、國內是休想駐足的！」但是我的意思已決，「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我只有謝謝這位銀行家的好意，並再三對杜先生道歉而已！

後來據杜先生說，翌晨戴笠在南京果乘車往車站來接我們，接不到人，只得喪氣乘原車而回，那天早晨適有傾盆大雨，泥濘溜滑，半途車子翻覆，弄得全身汚泥！實在對不住他。在他們看來，我大概是一個最不識抬舉的人！

別的不成問題，倘成問題的卻是上述某銀行家所說的話。我已拒約，有些熟悉實際情形的朋友便認爲我不宜再住在家裏，於是我只得隱藏。講到再流亡海外的計劃，我剛由海外回來不到四五個月，負債未清，在經濟力上也無法再作海外之行。但是愛護我的朋友都認爲我非速走不可。不得已而思其次，想到較近的香港，這樣促成了我的第二次流亡。

當時西南也在要求中央領導抗戰，也是救亡運動蓬蓬勃勃的一個區域，香港雖是英國的殖民地，但在地理上和西南很接近。我到香港之後，便創辦生活日報，同時編行生活星期刊。（星期刊就是週刊，所以採用這樣累贅的名稱，因爲生活週刊已被封禁，改用另一名詞，在內地發行才不受阻礙。）當時的香港，文化園地非常荒涼，和在抗戰以後的情形相差很遠，當地日報每日銷數最多的不過五六千份，生活日報一出版卽每日銷

到二萬份，已震驚了香港的出版界，但是當時的香港究竟不宜於全國性的報紙，日報寄到內地，在時間性上已不免落後，而郵費又奇昂，因此生活日報每月虧本，虧到四五個月，無法再虧下去，只得自動停刊。同時也因爲救亡運動需要我再到上海，在事實上也無法兼顧。

當時編輯部人馬卻相當充實，有金仲華、惲逸羣、王紀元、及柳湜諸位先生參加。後來胡愈之先生由法國回來，也加入了我們的陣營。人力相當充實，而財力卻不夠雄厚。生活日報原在上海發起，原定資本三十萬，係兩合股份公司性質，承各處讀者踴躍投資，不到一個月已湊集資本十五萬元以上。那時國民黨中央黨部聞而震驚，聽說曾經開會討論，想單獨投資十萬元，後來因知道是兩合公司，雖多投資而亦無法操縱，只得作罷。生活日報原可順利產生，後因我受到政治的壓迫，實際上辦不起來，爲顧全投資讀者的利益卽本報的信用起見，將存在銀行的股款本利全部歸還。到了我第二次流亡到香港時，因係試辦性質，係由生活書店理事會決定資助，結果在經濟上是遭到相當的損失。

但是由於本報同人的努力，在推進救亡運動的效用卻有着相當的影響。當時民族統

一戰線已在積極醞釀中，而要迅速形成民族統一戰線，最主要迅速停止內戰，團結全國，一致禦侮。換句話說，國內必須和平統一，作爲團結抗戰的基礎，原有的內戰固然不應繼續，更不許有其他內戰的發生。當時中央與西南處於很尖銳的敵對地位，而我們堅持民族統一戰線的立場，持論和當時香港以及西南某些時論不同。他們有的站在袒護中央的立場，便主張中央用武力討伐西南；有的站在袒護西南的立場，便主張西南用武力反抗中央；總之一不幸而開火，無論誰打誰，新的內戰又起，這對於全國團結抗戰都是不利的。我們站在全國團結抗戰的立場，反對原有的內戰繼續下去，也反對有任何新的內戰又發生出來；不管它是國共戰爭也好，中央與地方戰爭也好，都是有利於我們民族的侵略者，都是全國團結抗戰的莫大的障礙，都是我們所反對的。我們主張中央應採納西南抗戰的請求，同時西南應力避與中央武力的衝突。我們的這種主張，曾在當時言論上作有力的表現，堅持到底，毫不動搖。

我們當時不但對於西南問題有這樣的態度，並推廣這個原則應用到整個的救亡運動，就是在團結禦侮的大原則下各方面都應該消釋前嫌，爲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大問題共同奮鬥——也就是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我們幾位在港的朋友曾爲着這個問題，討論

了幾天幾夜，結果草成了一本小册子，名爲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由我親自帶到上海，再和沈鈞儒章乃器諸先生及其他救國會諸同志作詳盡的檢討，經過港滬幾位朋友多次的商討和修正之後，（當時陶行知先生適因赴美經港，對小册子內容亦曾參與商討）最後由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諸先生和我四個人共同負責署名發表。這本小册子最初產生於香港的生活日報館，最後由上海印行普及全國，引起了全國各方面的重大的反應。這是在一九三六年六七月的時候。

除上述的那個小册子外，關於辦理生活日報的詳細情形，我曾有在香港創辦生活日報的經過一文載在拙著經歷一書中。在港發表的比較重要的文字，後來印成一本坦白集，把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收在該書附錄裏，以便瀏覽。

這些都算是我第二次流亡對於讀者諸友的報告。

在港辦報的時候，正是陳濟棠氏在廣東做「廣東王」的時候。我和他原無一面之雅，他聽見我到香港辦報，特派曾任經濟部次長的P先生由廣州到香港來約我去談談。P先生，我在英國時曾見過幾面，那時他在牛津讀書，我在倫敦及旅行到牛津時，都在

友人處遇着過他。我當時知道他是廣西派人物。大概政界人物在海外的時候，頭腦都比較地清楚，所以我們還談得來，雖並沒有過什麼深談。陳氏派他來約我，也許因爲知道他在英國的時候認識我。我站在新聞記者的立場，距離香港近在咫天的廣州當局約去談話，當然是願意一行的，所以便偕同P先生赴廣州。我因職務很忙，所以言明當天到廣州，當夜談話，第二天卽須回港。

到廣州後，承陳氏派副官招待，先在一個很講究的旅舍休息一會，當晚卽往陳氏所自建的花園別墅。（似是這樣名稱，或是小花園，已記不清，總之是在廣州一個很有名的很講究的建築。）他有好幾輛很寬大講究的汽車，特派副官乘一輛來接我去。近別墅及別墅內武裝保衛森嚴，持鎗鵠立，見有陳氏副官陪着一人乘着陳氏自己的汽車疾駛而來，也許以爲是什麼大官兒，都大行其敬禮，不知道只是一個新聞記者。陳氏聞報，親至車旁迎接，身穿灰藍色綢衫，彬彬有禮，看上去卻好像鄉間來的一位財主士紳。我們大概單獨兩人對談了二小時，談的是抗戰問題。當時西南有不少人認爲非倒蔣不能抗戰，陳在當時也有這類意見，這和我上述的團結禦侮的意見不無出入，我便盡其所知，詳爲說明。臨行時，仍由他的副官乘汽車護送，他親自送至車旁，親自代關車門，行一

深鞠躬禮而別，頗能謙恭下士。

第二日仍由P.I先生陪送我乘火車回香港，臨行時他說：「陳老總覺得文人生活艱苦，如你同意的話，他想送你三千元，聊表微意。」我謝謝他的體恤文人的好意，但表示我辦報辦刊物，向來以不接受任何方面一文錢爲鐵則，所以請他代爲婉謝。

後來李宗仁氏到廣州，也約去談了一整天；白崇禧氏到廣州也約去談了大半天。他們的抗戰情緒都非常高，但因爲西南和中央仍處於敵對的地位，大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我對於國內外形勢及全國必須團結始能禦侮的意見，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李白二氏，我以前也未見過，但是他們直截爽快，我們一見如故，尤其因爲他們主張抗戰，談話易於接近，雖則李更直率，白較深沉。

後來幸而由於全國民衆的實際要求，全國輿論的呼籲督促，不但西南問題終於和平解決，即國共戰爭也得到和平解決，於是內戰終於避免，民族統一戰線終於形成，抗戰才得實現，這雖是某些妥協陰謀派所疾首痛心，卻是全國愛國同胞所額手慶幸的。

這決不是一二「腦殼」或少數人的「腦殼」起了什麼神祕的作用，而是全國民衆的實際要求所反映。能符合這種反映的主張或言論才有力量，否則無論你如何自信神通廣

大，無論你怎樣賣力開倒車，都是徒然的。

想起在第二次流亡中在香港辦報辦刊物的經過，我不由自禁要很沉痛地紀念不幸早死的工作同志王永德先生。他在世時我就稱呼他「永德」，因爲他眞是我們裏面一位小弟弟，死時年齡才二十歲左右，如果他親耳聽我稱他做「先生」，也許要叫我收回的。

永德常熟人，是生活週刊社公開考取的第二個練習生，（後來生活書店規模漸大，一考取練習生，一次就是一二十個，最初規模小時，每次考取一個兩個而已）來時年才十四歲，沈默寡言，勤於學習，業餘自修非常勤奮，所以進步非常快。對職務忠誠切實，富責任心。我辦大衆生活的時候，他就擔任助理編輯，同時相助辦理文牘。你看他那樣年才十幾歲的小小個子，他的學識由於數年間的自修，已超過一般大學畢業生的文化水準，他的辦事經驗由於數年間的訓練，也已豐富純熟。每日各處讀者來信很多，有幾位同事幫我料理，他也是一個，每日各信由我親自閱看以後，口授答復要旨，他寫作已很純熟，常識尤爲豐富，每日持筆作復數十信，在不聲不響中辦得妥妥貼貼，視爲常事。有種青年容易犯一種毛病，卽知識稍有進步，卽虛驕之氣逼人，實際上由此阻礙了

自己的再進一步。永德剛剛相反，他愈求進步，愈不自足，愈虛心。他對事能從各方面看，能有充分的諒解精神，因此他的待人接物都有很合理的態度。因此許多同事對他都很敬愛。

這樣進步可愛的一位青年，不知怎樣竟被特務所注意，特務魔手的暗影已漸漸向他籠罩過來。我知道他在上海有這樣的困難，所以赴香港辦報的時候，就叫他隨後也來香港。生活日報開辦之後，他就擔任生活星期刊的助理編輯（該刊由我主編）他的知識和辦事能力比前更進步；而尤其使人感動的是他忠誠於職務，不怕麻煩，不怕勞苦的精神。我們在港辦報時，因資本有限，自己還買不起捲筒機，是租用大衆日報的機器，排字房也是租用他們的。當時香港排字工人的技能不及上海，而印刷機又須和別人分用，所以相當吃力。爲着生活星期刊的編排印刷，我們兩人常須共同工作到深夜，還要到印刷所中親自照料一切，幾次的校樣也要深夜在印刷所中臨時閱看。他自己只知工作，不怕勞苦，卻常常顧念到我的辛苦。他看到我日夜忙碌，過於疲乏了，便在深夜催我先回，說他可以久留一些時候，不至僨事。我雖疲乏，對於工作的興趣卻很濃厚，往往他催了幾次，我還不走，但是他總是時時關心，屢催不已。他那樣忘己地工作，那樣誠摯

地愛護同事的精神，使我得到非常深刻的印象，使我永遠不能忘卻。

一九三六年六七月間我由港回到上海，生活日報只得暫時停辦，但生活星期刊卻仍移滬續辦。永德不久也隨着到上海，特務的魔手暗影對他愈逼愈緊，屢次到辦公處來要尋覓「王永德出來談話」！我們以為他應該暫避，剛巧杜重遠先生要找一位朋友替他整理編輯獄中筆記，我們就請永德暫時在家裏做這件事，不必再出外，免得麻煩。這件事在他是可以勝任愉快的，我一建議，杜先生就贊成，他也同意。

永德把這本書很周到地編輯完成，正待付排由他校閱，不料不到幾天，我忽聽說永德患傷寒症躺在醫院裏。我趕緊跑到醫院裏去看他的時候，他人已糊塗，耳朵幾乎失聰，眼睛幾乎失明，瞪着眼望着我一聲不響。我想不到一個活潑潑的青年幾天不見就成了這個樣子，同時想到他近來的悽涼身世，不禁悲從中來，含淚附近他的耳朵問他道：「你身體覺得怎樣？我是××，你認識我嗎」？我這樣問了好幾遍，他才轉着模糊的眼珠，含糊呼「×先生」，接着就問：「杜先生的書印出了沒有」？永德的富責任心，於此可見；雖在這病苦的狀態中，他對於未完全完成的任務，還是念念不忘的。

這個有着光明前途的青年的可寶貴的生命終於無法搶救回來，殯殮的那一天，我和

許多同事都親自送他入棺，失聲痛哭，步行隨着他的靈柩到蘇州河旁，看他的靈柩抬上一隻船，準備載回常熟故鄉安葬，我們排列着對他鞠躬致敬，慘然而別，從此便和永德的軀殼永離了。

永德的軀殼雖不幸早死，他的精神是不死的。他所努力的是進步文化事業。進步文化事業是集合許多人的心血勞力而一點一滴地造成起來的，凡是在這裏面參加過或用過力量的人，對於進步文化的總成果便是盡了他的一部分的力量，他的成績便融合在這總成果裏面，不會白費，即令不幸中途放下他的武器——文化戰士的武器——還有無數同志會繼續不斷地幹下去，不但力量不會白費，即繼續性也不會中斷的。當然，這裏指的當然是進步文化事業，有益於大衆，有益於革命的文化事業，只有這樣的進步文化事業才能隨着時代的進步而一同進步（就另一意義說，同時也是時代進步的推動力）。

從這個意義說，永德的精神已是不死的了，雖則他在世的時間太短，給他貢獻的機會太少，如果他能永年，必能成爲一個更完備的更熟練的文化戰士，如今都屬無望，這未嘗不是進步文化界的一個損失。我爲着這個文化戰士的夭折，想起他的苦戰的精神，他死後我在編輯室裏獨自辦公的時候，爲着他哭了好幾回。但繼而細想，永德的夭折，

雖是由於病，而黑暗勢力的逼迫摧殘，逼得他心神不安，也是使他短命的原因。我爲他哭有什麼用？他的武器不得已而放下，我應該更堅決地更英勇地拿起我的武器，在苦難中和黑暗勢力作繼續不斷的戰鬥。我遇到困難而不退怯，雖在流離顛沛艱苦危難之中而不爲不義屈，在這樣的時候，我每想起爲着進步文化而艱苦奮鬥至死不屈的同志如永德的苦戰精神，——直至今日，還有一位生活同事在集中營中，一位生活同事在牢獄中，一位生活同事在失踪中——這些文化戰士的奮鬥精神，犧牲精神，常使我在悲憤悽切的心境中增加千百倍的勇氣和決心。當這樣的時候，我一面固然深深覺得不應放棄自已應盡的任務，而同時也深深覺得我不能辜負他們，我應該如上面所說的更堅決地更英勇地拿起我的武器，在苦難中對黑暗勢力作繼續不斷的奮鬥。我應該「戰至最後一滴血」！

我深信永德的純潔、忠誠、英勇、同志愛，將永遠遺留在後死的許多同事中，將永遠感動激勵後死的爲進步文化而努力的許多同志。就這個意義說，永德的軀壳雖死，他的精神也是不死的。

關於第二次流亡的前後情形，大略已談過了，最後還有一個小小有趣的註脚。

杜月笙先生挺身出來，願陪伴我赴南京一行，當時不去的決議是否正確，在三年後無意中得到間接的證明——證明當時不去是對的。原來大家認爲有杜老板「保鑣」是不成問題的。但是這種保證卻也難說。吳老老（稚暉先生）等四老不是也曾經拍胸脯擔保過讓李濟琛先生赴南京嗎？後來李先生還不是仍被扣留下來？我在國民黨看來，夠不上比李先生，杜先生在政府方面看來也不見得比得上吳老老。但是當時也有人估計不致有任何意外像扣留的事情發生。三年後我在重慶，張岳軍先生（羣）有一次在和我談話中無意中提及，說：「你們大家應該好好地和蔣先生合作，蔣先生，實在是非常重視人才的，那次約你赴南京面談，就因爲陳布雷先生太忙，要請你留在南京幫幫布雷先生的忙。」我聽到這番話，才恍然那次如赴南京，原來有做「陳布雷第二」的希望！我自問夠不上算什麼人才，但在蔣先生方面也許如張先生所說，是出於一番好意，不接受這番好意似乎是所謂不識抬舉。但是就我當時在救亡運動中的工作看來，就我當時在進步文化的崗位看來，誰都看得出這是等於扣留或軟禁的。而且如果是眞正的扣留，還只是消極地做階下囚而已，一經「抬舉」，尙須做工作，假使叫我起草當時的所謂「睦鄰」政策的文章，或是抹煞救國運動的文件，我將怎樣辦呢？所以結果，比眞正扣留更糟糕！

「陳布雷第二」！陳先生原是我所敬重的前輩，對這個名詞作何感想呢？我說陳先生原是我所敬重的前輩，這不是空話，有文爲證。我在生活週刊上曾經有一篇專訪陳先生而記述下來的文章，把他的爲人介紹給有志的青年朋友。當時他擔任上海時事新報的總主筆，程滄波助他寫社論，潘公弼先生擔任總經理，我擔任祕書主任，我們幾個人都很談得來，私人友誼都很好。布雷先生在報界文壇的聲譽，在商報時代就已建立起來。他當時不但富正義感，而且還有革命性。當時人民痛恨軍閥，傾心北伐，他以畏壘爲筆名在商報上發表的文章，往往能以銳利的筆鋒，公正的態度，盡人民喉舌的職責。他對文字修養非常注意，可謂一句不苟，而對於每日的社論題目，尤能抓住當前最核心的最爲人所注意的問題。例如在報館裏深夜，社論已草就，報已將上機印刷，雖遲至二三點鐘，如臨時有專電到，有重要問題發生，他不顧疲乏，不肯偷懶，甯把已草就的社論擱置而重草新題。第二日各報或僅有專電載其事而言論無有，商報則切當的言論和重要的專電同時出現，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他這種對於職務的認眞精神，也是值得做模範的。

但是我如果不怕開罪前輩的話，我應該老實說，在蔣先生左右的布雷先生和在上海

報界時代的畏壘先生已截然若兩人。我的意思倒不是說布雷先生不該在蔣先生左右，而是說他入了政界以後，只是消極地做起草人，而不能以有眼光、有膽識、符合人民屬望的主張匡助蔣先生，也不能排斥國民黨反動派的種種荒謬措施。陳先生個人仍然是個好人，待朋友仍然是那麽誠懇，我和陳先生的私人友誼仍然是好的，（雖則我們今日談到政治問題不免背道而馳，格格不相入。）但是以陳先生所處的地位，僅僅個人獨善其身是不夠的。所以講到後半段歷史的陳先生，我要直率地說我不願做「陳布雷第二」！因此我說那次不赴南京的決議是對的。

接着我應該談到第三次流亡。但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流亡之間，還有一段插曲，那就是和救國會幾位同志在蘇州八個月的鐵窗生活。關於這一段插曲，我在獄中所著的經歷一書已有相當的報告，沙千里先生還著有七人之獄，其中有不少可珍貴的歷史材料，可供參考，所以在這裏沒有複述的必要，不過經歷所述止於檢察官起訴的時候，開審以後的情形便未及有所記述。關於開審的情形，當時全國各報也都有記載，這裏只想報告一些有趣的零星事實。

當時我們幾位爲着救亡運動而身入囹圄，在個人方面的利害都看得很輕，仍然注意於如何開展救亡運動以達救國的目的。因此對於公開審問，認爲是宣傳救亡的一種機會，一點不肯放鬆，大家對於那位蕭檢察官的黑着良心有意誣蔑周納的鬼話，都在獄中準備好嚴厲駁斥的材料。（聽說那位蕭檢察官因爲這次完全聽着黨部中的老爺們牽着鼻子走，盡賣力誣陷之能事，竟升了官，我們應該替他道賀！）尤妙的是李公樸先生，他好像在學校時代準備演說競賽似的，不但把所備的材料念得爛熟，而且還要在號子裏大練其嗓子。他的身體本來很堅強，嗓子本來很結實，再經一鍊，更要震動屋瓦。在開審的那一天，我們在待審室裏，就聽得到他在法庭上嘩啦嘩啦，大家已不禁失笑，他被審問後跑出來，第一句就急急地問「我的嗓子如何？我的嗓子如何？」我說你放心，一兩千聽衆一定會對於你的救亡偉論都聽得淸淸楚楚。他聽了才用手拉拉他嘴旁像張飛般的那一大把鬍子，把心放下，好像如釋重負似的！

王造時先生是一位名教授，又是一位有名的演說家，他在法庭上立在法官案前被審問的時候，原是朝着法官，回答法官的詢問。但是他好像把法庭看作救亡運動演講大會，回答時侃侃而談，口若懸河，揮手大作其演說家的姿態，便說便把身體慢慢向後

轉，先轉三十度，慢慢增加，差不多斜對着他後面擠擠滿堂的聽衆。他好像不是在回答法官，而是念念不忘去對着他後面的許多聽衆！法官很客氣地請他把臉回轉來對着他，他只好照辦，但頃刻間又慢慢由三十度而向後轉，引得全堂大笑。

沈鈞儒先生年高德劭，愛國熱誠，感動全國，他那一副美髯，和他的藹然仁者的岸然道貌配合在一起，尤使人肅然起敬。審問我們的那位法官總是多少還具有一副好心腸，（至少和那位檢察官不同）他看見沈老先生久立作答，大概心裏覺得不忍或慚愧，屢次很謙恭地請沈老先生就坐（臨時備有一張椅子給他老先生坐），老先生甯願和其他救國同志共甘苦，不願獨坐，始終未曾應允。

當時我們七人，每人有三個律師辯護，都是上海名律師，自願擔任義務辯護，三七二十一，共有二十一位律師，成爲一個律師團。開審的那天，他們都穿着律師出庭穿的「道袍」，（好像道士穿的道袍，故借用，）分成兩排坐在聽衆的前面，面對着法官。那種現象眞的好像一羣道士在那裏念經拜懺似的。那個黑着良心周納誣陷的檢察官雖坐在法官旁邊，卻大擺其臭架子，各位律師把他所說的鬼話駁得體無完膚，啞口無言，張志讓律師當日爲沈老先生的辯護人，不知說了什麽直率的話，那檢察官居然老羞

成怒，大發雷霆，說他侮辱了檢察官的尊嚴，大聲問他姓甚名誰，張律師也嚴正地照答，他竟倚仗官勢，叫書記把張律師的姓名記下，好像有什麼神威隨後可以施展出來似的！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他那種荒謬舉動激動了全體律師團的公憤，兩排律師全體起立，嚴正地聲明他們和張律師同一意見，如要叫書記寫什麼姓名，可把全體姓名寫下，這樣使得那個擺臭架子的檢察官嚇得面色蒼白，啞口無言，盡上海人所謂「坍台」之能事！（用國語說來，便是丟臉。）這種地方也可以看到集體的團結的力量。

開審的日期，由看守所押到法院，要經過幾條街，當局竟把梁山泊上的好漢相待，凜於民衆愛國的熱誠，恐有「刼獄」之舉，眞是防衛森嚴。四輛汽車，除史大姊（史良律師，我們都稱他爲大姊）獨乘一輛外，其餘二人一輛的旁邊踏板上站着兩個憲兵，兩個警察，全體持鎗上刺，眞是嚴重得很。沿途街上警察加雙崗。李公樸先生和沈老先生同乘一輛，而且先行，他們兩人都有鬍子，雖則老先生有的是美髯，而李先生卻滿嘴像板刷！沿路站崗的警察不知出於什麼誤會，對於第一輛汽車（卽李沈兩先生所乘），經過時都立正行禮，李先生說他一路忙於還禮，都是爲着那把鬍子受累，（他以爲因爲他的鬍子尊嚴！）但他同時卻大拉其鬍子，認爲這把鬍子不可不留！

抗戰國策既經決定，我們也於一九三七年八一三的前夕被保釋到了上海，參加抗戰工作。

現在要講到第三次流亡了。

第三次流亡的心理，和第一第二兩次以及以後幾次都迥然不同。以後的暫且不說，上面所談過的第一次及第二次的流亡，顯然和政府當局是有着矛盾因素存在，是由於受着內部政治的逼迫而流亡的。第三次流亡是在八一三抗戰發生以後三個多月，國軍因戰略關係而退出淞滬，轉移陣地，我們的文化工作及後方工作也隨着國軍轉移陣地而轉移陣地，其情形顯然和第一及第二次不同。第一，此時政府的抗戰國策已定，且已付諸實行，全國已經和平統一，西南問題固然已和平解決，即國共第二次合作亦開始實行，全國在中央政府領導之下，同心協力，團結禦侮，參加救亡運動的許多同志，不惜冒萬險，排萬難，唯一目的在形成民族統一戰線，實現團結禦侮的局面，到了這個時候，雖僅粗具規模，尙有許多困難尙待克服，有待於更艱苦更忍耐的努力奮鬥，但就抗戰而論，政府和人民已打成一片，光明的前途實已顯露其曙光。第二，在八一三淞滬戰爭開

始以後，軍民聯席會議，各抗日黨派代表與黨政軍當局的經常的聯席會議與合作，民衆運動的相當開展，前後方工作相當聯絡，都使人感覺到精誠團結一致禦侮的開端，雖則其間還有許多做得不夠的地方。我一面聯絡同志創辦抗戰三日刊，一面參加上述各項工作。即生活書店的許多同志，也全體動員，除原有文化崗位的工作外，也量力紛紛參加其他後方工作，精神上都是十分緊張而愉快的。這和其他時候在流亡以前是在遭受着內部壓迫的，使人透不過氣來，在心境上是完全不同的。第三，凡了解中國這次的抗戰是持久戰的性質，決不幻想在八一三開始的淞滬一戰即能像奇蹟似的達到整個民族解放最後勝利的目的，所以那時的依照原定計劃或依照戰略轉移陣地，決不是中國的妄自吹牛，而是含有中國抗戰所固有的本質，雖則因人事未盡，像南京的迅速潰退及廣州的倏忽淪陷，其間遺憾之處還是有着不少，令人不勝憤慨的。由於中國抗戰的整個過程是持久戰，在某種情形下依戰略轉移陣地不但不是可悲而且是必要的，所以我們在八一三淞滬戰爭堅持三個多月以後轉移陣地而隨着流亡，也只是爲工作的轉移地點，而和因爲內部政治的逼迫而流亡，其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其他的流亡的意志也不是消極，也是向前積極努力奮鬥，那末這次的流亡更富有向前積極努力奮鬥的意義了。

當日有英美法勢力存在着的上海租界存在，日軍雖已橫行淞滬，而藏身租界中的抗日份子尚不致無法脫身。我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離滬，乘輪赴港，由法租界碼頭上渡船，自渡船至輪船間尚有一大段水路，已有好些日本軍官乘小輪來來往往梭巡檢查，我改裝雜在渡船人羣中，未被注意，上輪之後，見金仲華先生和他的妹妹端苓已先在，我們三個人同一艙，倒也不寂寞。到港之後，先後到者已有多人，如張仲實、錢俊瑞、楊東蓴、沈茲九諸先生都已到，我們住在一個旅館裏，商量路程。

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已移到武漢，所以武漢成為我們的目的地。我們決定由廣州經衡陽往武漢。當時廣西省主席黃旭初先生適往鄉間視察，李白二先生在前線督師，桂林由參謀長夏威先生坐鎮。剛巧白先生的閔祕書因事在港，正要回廣西，我們知道夏參謀長聽說我們這一批人要經過廣西，特電李白請示，李白復電囑予招待，即由閔祕書陪我們同往，這給與我們以不少的便利。

尋常的流亡生活，在途中總是要在隱藏的狀態中，這一次人數既多，又是浩浩蕩蕩地公開進發，在流亡生活中可謂別開生面。途中大概費了半個月，經過的情形，我寫有連載的十幾篇文章，到武漢即登在抗戰三日刊上，後來收在拙著再厲集裏，在這裏不想

詳述，值得特別提起的是當時廣西許多男女青年學生——自初中至大學——的求知精神和誠懇態度，以及青年活潑可愛的氣概。

我們由香港乘小輪先到梧州，除應當局的招待外，最忙的是回報青年朋友們的要求。我們除對他們作大規模的演講外——我們同行的一批朋友全班上場，聽講的男女青年以數千計，還不夠，我們住的旅館裏，客堂裏，客廳裏，乃至房門口，都擠滿了無數的男女青年，他們急於要提出許多思想上的問題，抗戰的問題，戰時教育問題，以及在抗戰期間與青年切身有關的其他種種問題，向我們提出商榷。這許多可愛可敬的青年朋友，實在使我們太感動了，我們這一批朋友都一一接談，談至午夜尚不能完了，第二天早晨天剛亮未久，我尚未盥洗，下牀開門一望，已見房門口站滿了不少人！我只得一面洗臉，一面繼續談話。青年朋友的誠摯勤奮的精神實在太令人感動了！

我們經過沿途各地點，都有這樣的情形，到桂林因學校多，就更忙。我們這一批朋友，戲稱自己這一羣爲「馬戲班」，這當然並不是說我們會做什麼「馬戲」，卻是說我們形成了一羣：金仲華先生講國際問題，張仲實先生講思想問題，錢俊瑞先生講農村經濟問題，楊東蓴先生講戰時教育問題，沈茲九先生講婦女問題，我講團結抗戰問題。到

一處便有許多青年朋友和我們商榷這個問題，討論那個問題，鬧熱得什麼似的。在桂林有一天下午我和金先生應廣西大學學生之約，本來預備每人演講一小時至一小時半，但是因爲全場千餘的男女同學非常熱烈，大家繼續不斷地提出許多問題來商討詢問，竟從一點鐘講到六點鐘，還全場空氣緊張，興趣濃厚，我和金先生也非常興奮，輪流答復，始終不覺疲倦。後來該校教務長先生因時間太晚，同學們要吃晚飯，才宣布散會，答應他們以後有機會再談。

當時廣西的青年有這樣蓬勃興奮的求知精神，固有青年的本色，而廣西當局對於教育文化及指導青年的比較開明的政策，也值得我們的欽佩。

當時我們和許多青年談話中，他們裏面思想水準較高的，對於廣西省黨部的某委員表示不滿，說他不能了解青年，甚至有壓迫青年思想的行爲。我們有幾次在各處演講，這位委員總是殷勤相陪，有人說他是意在監視我們，我們當然不敢無故妄加猜疑。不過有一次他聽到錢先生講農村經濟問題，強調農民生活的苦況，有加以相當改善的必要。在抗戰期間，有相當改善民生(尤其是下層民生)的必要，這原是常理，並不足奇，但聽說這位委員在背後已嘖有煩言，認爲錢先生有煽動「階級鬬爭」的嫌疑。以這樣頑固的

成見來領導青年的思想，不免要引起青年的不滿意，卻是意中事。這位委員原屬廣西派，後來聽說他加入了CC派，對壓迫青年思想有變本加厲之勢。這個傳說如果屬實，我們不禁為廣西痛惜。

當時這位委員幾次相陪，聽到我們「馬戲班」幾次「表演」之後，覺得我們所諄諄啓迪青年的都重在顧到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重在團結全國禦侮，對於中央有着善意的態度，對於國民黨也有着善意的態度，頗以為異，他說這樣好的態度，在他也是可以接受的。我們間接聽到這種說法，也「頗以為異」，因為我們的態度始終是這樣的光明磊落，大公無私，他何以在相陪幾次之後才「頗以為異」？其實有何「可異」之處？

平心而論，國民黨肯以善意對待抗日各黨派，抗日各黨派必然會以善意對待國民黨；國民黨所領導的政府肯以善意對待抗日各黨派，抗日各黨派必然會以善意對待國民黨所領導的政府。所謂善意，決不是指煦煦小仁，或施以利誘，也不是籠絡以高官厚祿，而是國民黨及其所領導的政府在政策上必須符合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和希望。人民希望團結抗戰，即不應縱任少數人破壞團結，間接即破壞抗戰；人民希望眞正民主政治的實現，即不應拖延搪塞，甚至反民主，提倡新專制主義；人民希望進步文化的發揮光

大，卽不應壓迫思想，開倒車，摧殘進步文化。

這樣不但能造成全國抗日黨派的精誠團結，協力合作，卽國民黨本身，也在進步的大道上向前邁進，有着光明燦爛的前途，這是國民黨之幸，也是中華民國之福。眞正愛護國家民族的，應該這樣勉勵國民黨；眞正愛護國民黨的也應該這樣督促國民黨。

我們這個「馬戲班」大概於二星期之後達到了武漢。我們仍集體地住在漢口「文化街」（交通路）金城文具公司樓上。（楊先生例外）我們一方面各就自己的文化崗位上工作，一方面參加後方的抗戰工作。講到抗日各黨派的團結合作，一九三八年可謂最盛的一年，國民參政會第一屆在武漢成立，雖組織和職權距眞正的民意機關遠甚，但政府的確延攬了抗日各黨派的若干重要份子，表現一種新的氣象。民衆運動方面也有相當的開展。我一面主持文化事業，主編全民抗戰三日刊，一面參加「參政」及救國團體活動。

但是不幸這只是「曲線」的最高峯，一九三九年這「曲線」便逐漸下降，愈逼愈緊，一九四零年我不得不作第四次的流亡。

第二章　離渝前的政治形勢

八一三全面抗戰開始，如把政治的進步當作「曲線圖」來看的話，那麼可說這「曲線」是開始漸漸向上升，取徑儘管迂迴曲折，而漸漸上升卻是事實，而其主要的象徵或經緯則爲團結和民主。如我上面已經說過，中央和西南似乎箭在弦上的內戰危機得以消除了，國共內戰亦得以結束了，全國團結禦侮的局面由是建立了起來。這是關於團結的象徵。在全面抗戰初期，政府即迅速在南京成立國防參議會，延攬抗日各黨派的若干領袖參加，共商國事，雖規模簡陋，但用意是要向民主的初步走去，却是一種好現象。到武漢後，規模更加擴大，內容更加充實（比較國防參議會而言）成立第一屆國民參政會。這是關於民主的象徵。

當然，所謂團結並不限於內戰的消弭與停止，所謂民主亦並不限於國民參政會一個機構，凡是關於民衆運動（包括民衆團體的組織與活動），關於文化活動（包括言論出

版集會結社自由，以及教育政策及態度等），都隨處和團結及民主發生關係。當時劭力子先生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對於文化的政策和態度，的確較後來的開明得多了。

所以我說那時的政治「曲線」是漸漸向上的。但是我也說過，一九三八年是政治「曲線」的最高峯，一九三九年便很不幸地漸漸往下降了。至一九四一年的皖南事變後的數月間降到最低度，在妥協陰謀派大有重新擴大內戰以破壞抗戰的企圖！（後來如何避免了這慘劇，下文要說到）

自一九三七年的八一三起，至一九四一年的四五月止，這三四年間的一段有關中國政治「曲線」升降的實際情況，我在拙著抗戰以來一書裏曾有比較有系統的論述，所搜集的材料比較充實豐富。我在那本書裏特別注意客觀的事實，眞實的材料，自信是出以沈痛的態度和誠摯的心情，仍在誠懇希望國民黨能虛心反省：容納諍言，使國民黨從開倒車的泥淖中轉到進步的大道上。國民黨是當今執政的政黨，如能從開倒車的泥淖中轉到進步的大道上，中國的政治「曲線」便只會直往上升，而不致下降，這不僅是中國之福，也是國民黨之幸。我的那本書也許不免直率，但却是本於這個動機而寫成的。（是我在一九四一年三月第四次流亡到香港後寫成的。）

我希望那本書能做本章的參證資料，有許多事實，我便不想在這裏再作詳細的複述。我在這裏只想說明我第四次流亡前夕的政治形勢和由政治「曲線」下降而影響於進步文化的情形。

一九三九年，政治「曲線」逐漸下降，華北發生國共間的「軍事摩擦」，大後方發生國民黨和各抗日黨派「文化摩擦」。其實「文化摩擦」這個名詞還不能成立，因爲軍事還可以武裝對壘一打，受壓迫的方面還有武裝可以來抵抗一下。講到大後方的進步文化，一遇到國民黨的壓迫，那就只有受壓迫能了，在壓迫得透不過氣來的時候，疏解和抗議都無用，壓迫者是可以任所欲爲，倒行逆施的。

各抗日黨派只有國共兩黨有武裝，所以「軍事摩擦」只限於國共兩黨。關於這件事，何應欽氏以參謀總長的資格在國民參政會中報告軍事的，只根據國民黨「摩擦專家」的單面報告，大放厥辭，置對方將領的無數報告的事實於不顧，完全抹煞，一字不提。這種偏私的態度引起了中共參政員的嚴重抗議。這種情形也引起了國共兩黨以外的各抗日黨派的焦慮，因爲在此抗戰時期，槍口應該一致對外，內部的「軍事摩擦」如果

擴大，徒然消耗自己的力量，有利敵人，這對抗戰是大不利，是很顯然的。他們再三加以考慮之後，覺得要根本「治療」，達到和衷共濟的目的，還是要在民主政治方面着手，於是在第三屆國民參政會開會時，實施憲政的提案有如雨後春筍，由國民黨以外的各抗日黨派紛紛提出。

國民黨聽到這個消息，覺得憲政是中山先生遺教中所固有，沒有反對之餘地，為搶先一步起見，特由國民黨在參政會中的黨團迅速囑由十九位國民黨參政員也提一個實施憲政的議案，只是措辭與衆不同，是要承襲國民黨在民國二十四年所公佈的國民大會老案而籌備的。這樣一來，又伏着多少暗礁，因為以前已選出的大部分國民大會代表，都是賄選出來的，鬧過不少笑話，（且而據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葉楚傖先生所自稱過半數已做了漢奸，）組織法也是在國民黨與其他黨派合作以前所規定的內容，有許多和抗戰以後的情形全不適合。時期不同，時代進步，所用辦法原可重加考慮，這是很尋常的事，但是國民黨當局卻咬定要完全照舊的，各方面所舉行的憲政座談會中禁止討論以前所公佈的國民大會選舉法和組織法。

此外，國民黨以外的各抗日黨派認為在實施憲政以前，應展開憲政運動，由各界舉

行憲政座談，給與國民以教育的機會，也只有人民都能起來關心憲政，憲政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而不是少數人的玩藝兒。這一點又得不到國民黨當局的諒解。當時國民黨的中央黨部祕書長葉楚傖先生對人說：「你們少數學生在房間裏研究研究憲政是可以的，何必各界民衆開什麽憲政座談會呢？」他們的意思，憲政運動最好是限於「房間運動」，不必混入什麽民衆運動！說來似乎奇怪。憲政運動的提倡，原是抗日各黨派鑒於黨派的摩擦，有礙團結抗戰（及建國），苦心孤詣想用憲政來增加和諧，鞏固團結，不料卻因國民黨有些人的堅持頑固成見，反而引起不少的糾紛！這實在是和我們的原旨相違背的，關於這一點，國民黨的頑固派實不能不負其責。

關於戰時首都各界憲政座談會所鬧的笑話，我在拙著抗戰以來一書中曾有述及，在這裏不想再說了，但有一件事未曾提及，可在這裏附帶談談，那便是中央大學的學生所舉行的憲政演說大會。

當時偶有朋友從西安到重慶，看到重慶報上載有什麽憲政運動的消息，認爲是奇蹟，因爲他說在西安乃至西北各地報上（延安除外，新華日報上載有該處憲政運動的熱

烈情形。）根本就看不到有憲政這兩個字樣、根本就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可見當時國民黨當局對於這個運動封鎖的厲害。但是憲政運動究竟是根據中山先生遺教的光明磊落的事情，所以在戰時首都及其附近的較大的地點不能完全加以封鎖，至多只能消極或實行相當「抵制」的辦法。在這種情況之下，民間的團體或學術機關還有陸陸續續的什麼憲政座談會或演講會出現。重慶中央大學便是一個例子。

最高學府的中央大學也要舉行一個憲政演講會，有些學生要請我去演講，我當時是國民參政員，對於憲政運動是非常積極的一份子，在我所主持的言論機關也發表過不少提倡憲政的言論，有些學生想到我，學校當局似乎不便遽加拒絕，但是所謂「三青團」的份子便着了慌，所以同時決定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王世杰先生也來演講，後來因為王先生剛巧在那天有別的事，便由副部長潘公展先生出馬。潘先生本來是我的老朋友，在五四運動時期，上海學生聯合會辦有小型日報，由潘先生主持其事，我也在編輯部幫忙，他時常要我們這班「客串編輯」寫些文章，所以很相熟。後來他在上海商報服務，我也在上海時事新報服務，算是報界同人，時常晤談，彼此友誼很好。我們現在見了面，在私人友誼上還是客客氣氣，殷勤相待的，但是因為政治的立足點有了差異，私

人友誼也就降到次要甚至不重要的地位。那天的情形便是一個顯明的例子。

他明明知道我是積極主張民主政治的，同時也明明知道我是積極主張抗日各黨派應該爲着抗戰建國而精誠團結，協力合作，而不應該發生摩擦以消耗國力甚至存心要「消滅異黨」而引起許多無謂糾紛的。我現在不想細述他在憲政講壇上講了許多話在實際上是在反對憲政運動，而極力推崇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我只想提及他在他的講辭快結束的時候，突然圓睜了眼睛，張大了喉嚨，面紅耳赤，握緊拳頭，大聲疾呼道：「現在有人說蘇聯是最民主的國家，試問現在在蘇聯有的是一個黨，還是幾個政黨？」他用盡氣力高聲呼出了這幾句話之後，台下由「三青團」布置好的人們便拚命大鼓其掌，即仍然有着理智的青年朋友們眼看部長高高在上，「三青團」爪牙虎視眈眈，也只有沈默裝傻而已。

我知道潘先生對我個人並無惡意，他只是代表國民黨中一部分人發表意見而已。況且我們是在研究問題，並不是在爭辯，所以我心平氣和，態度從容。第二個輪到我講，我上台先不慌不忙地說明潘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我們所研究的不是個人問題而是國家大事，潘先生剛才所說的確是國民黨中有一部分人的意見，簡單說來就是要消滅異黨。這

是中國當前政治所以不能上軌道的癥結所在，的確是値得研究的問題。我說蘇聯現在只有一黨是事實，但是各國有各國的歷史，中國不是蘇聯，中國有中國的歷史。蘇聯原來也有幾個政黨，後來除了布爾塞維克之外，其餘各黨都陸續背叛革命，甚至黨內的孟塞維克也背叛革命，爲大多數人民所厭棄，所以剩下的只是一個黨。中國今日各抗日黨派都在抗戰建國的大原則下共同努力，團結則禦侮衛國的力量增加，否則禦侮衛國的力量減少，這種歷史的發展，和蘇聯當時是不同的。再則蘇聯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成功的國家，由歷史的演變而由無產階級的黨進行建國，中國在抗戰建國的時期都不只是由任何一個階級擔負責任，是要由全國各階級各階層協力合作而共同擔負責任的。關於這個問題，我們要仔細研究歷史，而不可就表面上看，拙譯蘇聯的民主一書（英國斯潘根據他在蘇聯視察五年的結果而著成的）對於這個問題有詳細的說明，可供參考，我在這裏不必多談了。

我接着說我是國民參政員，不是國民黨黨員，也不是共產黨黨員，在國民參政會開會的時候，我在會場中向前望望，看見國民黨參政員；向左望望，看見中共參政員；向右望望，看見青年黨參政員；向後望望，看見國社黨參政員。他們都是由國民黨所領導

的國民政府延聘而來的，可見團結抗日各黨派共同努力抗戰建國大業，是政府的國策，這國策是適應國家民族的實際需要，是全國愛國同胞所竭誠擁護的。但是如潘先生剛才所說，國民黨中確有一部分人幻想「消滅異黨」，和上述的國策背道而馳，阻礙或減少國策所能發揮的偉大的力量。

我最後說，我們如就實際問題的角度看去，是非所在，更爲明顯。團結抗戰建國，各黨派沒有話說，如國民黨必欲置國策於不顧而要「消滅異黨」，那末即就國共兩黨而論，都有武器，勢非引起內戰不可，此外有沒有辦法？全場默然。我說全場默然，可見大家都默認這話是對的，那末請進一步問；大敵當前，不團結禦侮而反自相殘殺，只等於破壞抗戰，陷國家民族於危亡之境，此外沒有什麼可得。全場又默然。我說全場又默然，可見大家都默認這話是對的。

大家默認，沒有話說，潘先生也微笑無言。

憲運動政的目的原是要團結抗日各黨派，（同時也就是團結全國）以增強抗戰建國的力量。倘若把憲政運動和「消滅異黨」等量齊觀，恰恰足以引起許多不幸的糾紛而減

弱抗戰建國的力量。這眞是所謂差以毫厘，謬以千里，不可不嚴格看清的。

但是不幸的是能夠鞏固團結的憲政（憲政同時還有革新政治等效用，這裏姑僅就鞏固團結一端而言。）終於流產，而前方的「軍事摩擦」，由華北而皖南，至一九四一年的一月底達到所謂皖南事變的最高峯，後方的「人事摩擦」亦變本加厲，愈逼愈緊。

所謂「人事摩擦」，是指國民黨一方面強拉人入黨，否則加以種種壓迫，如打破飯碗等等；一方面發現有其他黨籍者就加以種種壓迫，打破飯碗算是輕描淡寫，其較重者由特務老爺賜予一綁，鋃鐺入獄，或一命嗚呼！

中國的政黨，除國民黨外，最大的要輪到中共，這兩「大」「摩擦」也最厲害，其次像救國會也因爲救國的主張和公正的態度，尤其是進步文化的力量，受到全國廣大民衆的重視，也特別受到嚴重的打擊。（國民黨的反動派怕聽到「救國會」這個名詞，硬把救國會叫做什麼「人民陣線」，頗饒趣味，容後再談）此外如青年黨因爲在四川頗有「群衆」，也受到嫉視而引起「人事摩擦」或「文化摩擦」。

例如青年黨重要領導人之一的李璜先生（也是國民參政員）就曾經對我談起一件事，說有幾個教員因爲有了青年黨籍被發現，便被打破飯碗。李先生對此事當然非常憤

慨，他乘着和蔣先生見面的機會，把這件事很具體地告訴了蔣先生，並把因黨籍問題被打破飯碗的教員名單都交給了蔣先生。蔣先生聽了之後，認爲這是不應該的，他說：「我把青年黨的同志看作和國民黨的同志一樣，讓我叫他們查明糾正。」國民黨的總裁作了這樣肯定明確的答復，在李先生以爲可以放心了。但是此事並沒有得到下文，蔣先生儘管這樣說，黨部卻儘管那樣辦，不但此事得不着下文，相類的事件仍繼續不斷地發生，他說蔣先生日理萬幾，他又不好意思因這些瑣屑的事情常常去求見，去麻煩他。他說完叫苦連天，急得跳脚！

也是青年黨重要領導人之一的左舜生先生，富正義感，說話尤其直截爽快，他也談起一件事。他說有某君誠實可靠，做了十幾年的青年黨黨員，不願改黨籍，也因爲有人要再三強拉他入國民黨，他再三婉謝，飯碗岌岌可危，他不得已來見左先生商量這件事，左先生聽了之後憤然對他說，「不要緊，你仍然做青年黨黨員，同時不得已加入國民黨黨員也無妨」，左先生說得有趣，他說不多時他見到國民黨黨部的某負責人，他老實對他提起這類的事情，他說；「你們一定要這樣蠻幹，也好！我們也通令青年黨黨員可以跨黨，這樣還可以從他們得到國民黨黨內的許多祕密消息，倒是一件好事！」

以上所說的當然只是千萬件中的一二例子，而且這類「人事摩擦」當然不限於青年黨。至於無黨無派的當然也在被拉之列，在入黨和飯碗之間大費思索，由服務的機關當局發「表」塡註，一大批一大批實行其「集團入黨」！（有人說這是倣效頗爲摩登化的「集團結婚」，待考。）這不但實行於各機關，甚至舉行什麼會議的時候，也來這一套，例如在重慶舉行的小學教員會議，（詳細名稱已記不淸）就發共同宣言，實行全體入黨，也就是集團入黨！你常在報上可以看到用大字登出這類的消息！但是這樣冠冕堂皇的新聞後面，就伏有不少的「人事摩擦」。（我自己和我與許多工作同志所主持的文化事業，遭受到殘酷的壓迫，事業且遭到殘酷的摧殘，也和這個問題有關，也只是這整個逆流中的遭難的一部分而已。）後面要順便談到。

國民黨中不是沒有腦子比較淸楚的人，其中和我個人友誼好的也有，我有一次和一位國民黨參政員在他家裏一個房間裏兩人對談，提及這件事，我說任何政黨（國民黨也在內）要多得優秀黨員，這種合理的心理是可以了解的，但是現在國民黨用飯碗的威脅來強迫入黨，在大後方鬧得烏煙瘴氣，怨聲載道，實在令人百思莫得其解。好的政黨能起領導的作用就在集中優秀份子，不僅重量，尤須重質，這樣「兼收並蓄」，無所不

拉，於黨何益？假使全國國民都個個入黨，那黨的招牌可以脫下，換上中華民國的招牌，又何必有黨？他承認這種辦法是不對的，但卻輕輕加一句說：「總裁要這樣辦，有何辦法！」我想蔣先生不會見不及此，卽退一步說「總裁要這樣辦」，如果知道是不對的，大家也應該竭誠進言，不該只在房間裏咨嗟歎息而默無一言。他聽我這段不入耳之言，也只有默無一言而已。我暗中想這還是「領袖腦殼論」的遺毒在那裏作祟罷！

也許有人以爲這是「消滅異黨」的一種好辦法吧，因爲大家都進了國民黨，任何「異黨」都沒人做黨員，豈不等於「消滅」了嗎？這眞是想入非非之談，事實上的效果如何，不是很明顯擺在人人的眼前嗎？

「人事摩擦」是不該有的，也是不必要的，但是由於政治「曲線」的逐漸下降，「人事摩擦」也隨着愈逼愈緊，不但要強拉入黨，而且疑心生暗鬼，動不動就疑心你是什麽「異黨份子」，那就非嚴厲對付不可！

復旦大學的某教授告訴我，有幾個該校的東北籍同學，平日很勤學，但因不修編幅，常常髮蓬蓬而衣襤褸，被校外的特務老爺所注意，時有暗中追蹤探察之事發生，疑

心他們是「異黨份子」，他們蒙此不白之冤，駭怕極了，竟而不敢在校，不知躲在什麼地方去，宣告失踪！這位教授憂形於色，說好好青年，如此受壓迫，怎樣是好？該校校長還是國民黨黨員，聽說他還和CC派接近（大後方的文化支配大權，握在CC派手裏，這是公開的祕密，大家所知道的。）頗不高興，宣稱以後有事當由校長處理，無須校外特務費心。

卽令是蓬頭垢面，衣服不整，何以便有「異黨份子」的嫌疑？這點也頗費解。有人說，特務老爺這裏所疑的「異黨份子」，是指共產黨份子，因為他們認為共產黨能刻苦耐勞，蓬頭垢面，衣服不整，似與刻苦耐勞有關，所以便生疑問！如果特務老爺眞是這樣想法，眞是寃哉枉也，因為天下刻苦耐勞者多矣，並不限於共產黨。

可是這類傳說很盛。當時政界中人兼營商業以增加收入的頗多，卽令是中小公務員無力獨營，也多營營逐逐合力而經之營之。據說如有公務員只會刻苦耐勞，認眞辦事，而不想在生意眼上賺些外快，那也要被特務老爺認為具有「異黨份子」嫌疑犯條件之一！

除刻苦耐勞無意外快等等之類，他們當然也要注意思想行動。關於思想，特別注意

你看的書報。中央政治學校有個湖南學生，因爲偶然在抽屜裏被發現了一張新華日報，被確定是「異黨份子」，便立刻被開除，而且在冷天被強令他把身上所穿的冬季制服脫下，立刻離校。（該校名義上係蔣先生任校長，實際上是陳果夫氏任教育長。）那個學生無可如何，只得向認得的湖南同學借些衣服，勉強離校，一時幾陷於絕路。其實新華日報雖是中共的機關報，但卻經國民黨所領導的國民政府准予註册發行，所登的言論消息也經過國民黨所領導的重慶新聞審查機關核准的。既准它公開發行，認爲是合法的報紙，看的人——而且是偶爾被發現一張報紙的人——卻須受到那樣嚴厲的處分，在法律上實在是說不通的。（以上所述的事實，是被開除的青年親自告訴我的。）

講到行動，在重慶轟傳一時的中蘇文化協會同其他中英中美等的相類機關有同一目的，是旨在溝通兩國文化及增進兩國邦交的。該會是由孫哲生先生任會長，邵力子先生任副會長，完全是公開的合法的機關，且在國民黨要人領導之下的。該會有幾個高級職員於一九四一年元旦往蘇聯大使館賀年，意思也不過聯絡友誼而已，這在中蘇文化協會這樣的一個機構看來，原是極尋常的事情。郁文哉那天也冒冒失失地跟着他們前往，回來時不幸走得慢些，一人落後，竟被特務老爺綁去，認爲他的「行動」有異黨份子嫌

疑，後來雖經孫哲生先生設法保出，但已遍體鱗傷，背上打得血肉紛飛了！能夠由孫先生保出，算是萬幸，事後報上固不敢登一字消息，他也只得飲泣吞聲，不敢聲張。但是這件事卻已喧傳於重慶的文化界。

在蔣夫人所領導的婦女慰勞會重慶分會裏有一個青年婦女工作者周健女士，對於慰問及幫助抗屬（抗戰軍人的家族）的工作非常努力，不畏勞苦，聽說有十分之七八的抗屬都認識她，和她有深厚的感情。她爲熱忱所驅，往往忘餐廢食去做他的慰勞工作。但是她就因此「行動」被特務疑爲「異黨份子」，有一天深夜由兩三個便衣特務，居然在她的辦事處冒充周女士的朋友將她喊出，然後拿出手鎗威脅着她同走。她被禁在川東師範舊址，CC的中央調查統計局所管的防空洞內，關了好幾個星期，最後由蔣夫人設法保出，她只被打過手心算是輕之又輕的責罰了！

像郁文哉及周女士有國民黨要人設法保出，總算保了生命，其他沒有這樣保證的要人關係，爲着「人事摩擦」而被冤枉犧牲的，何可勝數！報上其先不敢直載這種消息，只說「失踪」，後來「失踪」登得多了，新聞審查機關大概覺得有礙觀瞻，連「失踪」都不許登載了。

「人事摩擦」似乎比「軍事摩擦」和平，「文化摩擦」似乎比「人事摩擦」和平，其實是同樣地殘酷，而且還要普遍化。「人事摩擦」不僅因入黨問題而打破飯碗，斷絕生路，往往因「異黨份子」問題而被綁入獄，斷送生命，父母不得而知，妻子無從探問，死得不明不白，其嚴重性往往非「人事摩擦」四字所能形容其萬一。

「人事摩擦」往往和「文化摩擦」連結在一起。說到這一點，我想起最可敬愛的一位青年朋友，他叫鄭代鞏原來是全國學聯的一位健將，隨後就主持救國會青年部工作。爲人深沈忠實而耐勞，他在重慶差不多以個人力量支持戰時青年月刊，不畏辛勤，奔走各校，聯絡進步同學，使該刊成爲他們的思想機關，故銷數驚人，爲青年刊物冠。最有趣的是當空襲警報來時，你可以看到他什麼都可以不拿，必須拿的是一個他所最寶貴的提箱，很沉着地一步一步向防空洞走，那只提箱就等於他的編輯部，裏面有的是戰時青年的文稿校樣等等！這樣忠誠於工作的可愛的青年，這樣不畏艱苦的青年，又被特務老爺認爲具有「異黨份子」的資格！有一天他在馬路上被一個特務老爺拿出一枝手鎗威脅着綁去，和郁文哉關在一處。文哉將放出的時候，他很誠摯地偸偸懇托文哉傳給救國會

同志令人聽了流淚的話：他囑同志們放心，他寧願一死，絕對不會做出對不住同志的事情。聽說特務老爺們也很佩服他的能力，所最不滿意的就是他有「異黨份子」的嫌疑！後來他們決定把他槍決，我們得到這個消息，都爲這位同志痛哭一頓。可是鄭代鞏的本領眞大，不知怎樣竟被他逃了出來？我們大家得到了這個喜信，都喜歡得說不出話來！他自己替中國保全這樣一個有爲的青年，眞是功德無量，可賀之至！可喜之至！

無論「軍事摩擦」，「人事摩擦」，「文化摩擦」，都隨着政治「曲線」的下降成正比例而尖銳化，而各種「摩擦」之間，亦彼此略有相當的連帶關係，雖則「軍事」比較有獨立性，「人事」與「文化」較接近，雖則「人事」與「文化」亦各成其獨立部門。講到抗日黨派關係，政治「曲線」下降，整個抗日各黨派關係亦隨之惡化，雖則其間惡化情形亦各有不同，大概依其力量成正比例。（指抗日各黨派本身的力量，）上面已經說過，「軍事摩擦」只限於國共兩黨，因爲在抗日各黨派間，只有國共兩黨有軍隊。但是因「軍事摩擦」使政治「曲線」愈益下降的惡影響卻不僅及於國共兩黨。例如一九四○年的下半年華北國共兩黨「軍事摩擦」尖銳化的時候，後方「人事摩擦」隨着日趨厲

害，中共的「異黨份子」固然首當其衝，青年黨的「異黨份子」也不見得能夠優游自在？上面所述李左所談具體事實便是典型例子。其他幹着愛國工作的積極份子如救國會會員乃至無黨無派被疑為有黨有派的無辜份子，都在殃及池魚之列。這種情形，到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底皖南事變發生時就更變本加厲，由「軍事摩擦」而蔓延為大後方「人事摩擦」，幾於隨處可以遇到，使關懷團結抗戰者發生異常深切的憂慮。

我們上面對於政治「曲線」下降中的「三擦」作了一番鳥瞰。為什麼有這樣的現象？「軍事摩擦」和「人事摩擦」原是兩件，可各自獨立進行，但是由「軍事摩擦」卻很容易連帶增劇「人事摩擦」，這需要簡單的說明。中國雖鬧了三四十年的民主政治，中山先生雖一生為此事而努力奮鬥，但在事實上中國到今日還是一黨（甚至一黨中的一派）專政。在抗戰初期國民參政會雖略含民意機關的一點點的微微的曙光，但至多只是政府的一個顧問機關，他的決議案並無代表民意監督政府之權或督促政府必須執行之權。在抗戰初期，政府延攬全國抗日各黨派若干重要份子加入該會，雖為上述職權所限，但溝通各方意見，主持正義，尚為國人所重視，隨後逐漸演變，至第三屆以後，成為CC派所操縱的御用機關，等於袁世凱的參政院。至於執行方面的政府，那更是單純

的一黨專政，即在形式上也沒有其他抗日黨派參加其間，——民選固然說不到，號稱民意機關還沒有民選可言，政府更不說；由國民黨領導的政府延攬吧，曾經有過一個鳳毛麟角的時期，即周恩來先生任政治部副部長不得不實際到部辦公的時期，這時期已成過去的了。

中央政府既在一黨專政之下，軍事委員會當然也在一黨專政之下，所以何應欽氏屢在國民參政會開會報告軍事的時候，完全採用國民黨在華北的摩擦專家的報告，置其他方面將領的報告於不顧，完全抹煞，一字不提，（這是據中共參政員轉述第十八集團軍所屢次報告的事實，當場提出抗議，認為何氏有所偏私，不然我們也不會知道的，）是不足怪的，因為他在形式上是代表軍事委員會乃至中央政府向國民參政會報告軍事，而在實際上卻處處只顧到國民黨的立場。

在這種情形之下，以「消滅異黨」為黨策的國民黨及其所領導（或支配）的一切機構對於「軍事摩擦」的看法當然很簡單，那就是萬方有罪，罪在對方。其他方面，——其他抗日各黨派及無黨無派立在團結禦侮的立場，看到「軍事摩擦」，總要審慎判斷，詳細探詢事實，說幾句公道話，有的還要奔走呼號，設法調解。這樣愛護團結抗戰愛護

國家實力的審愼的態度，便大大觸怒了在表面上似乎是在代表政府而在實際是在代表國民黨「消滅異黨」政策的某些人！（中山先生遺教中有不少進步的寶物，我們不能因這些人的不長進而一概抹煞！）這樣一來，你的頭上便很容易被人輕輕加上「異黨份子」的頭銜，於是前方的「人事摩擦」，有許多無辜青年便犧牲在特務老爺的辣手，紛紛「失縱」！

皖南事變發生以後，戰時首都的「人事摩擦」眞是緊張到了極點了。「人事摩擦」和「特務活動」是孿生子。各機關都散布着的安津貼的特務大活動。說也奇怪，有一天有兩個青年偸偸摸摸到我辦公處來看我，抽抽咽咽哭得像孩兒似的，原來他們是在中央某機關中被迫做特務，說以前係在上海某高中畢業，在報上看到某機關用某軍事機關戰時服務隊的名義招生，以爲是參加抗戰的良好機會，踴躍應考，不料從此投入火坑，被迫做特務，現在如不做而脫離，卽有被槍斃或被暗殺的危險，我說你們中途只須偵察眞正妨礙抗戰的漢奸，不做破壞團體的工作，於抗戰也是有益的。他們垂涕而道，能這樣安有不願之理？最苦痛處就在被迫殘害所謂「異黨份子」，摧殘無辜青年，苦苦求救於我，要脫離苦海。我說照你們目前情形，除乘機遠逃之外，想不出別法，遠逃也須有

相當充分準備，且須萬分機密，否則反有生命之危。他們淚如泉湧而別，來時爲證明起見還帶了一本千餘頁的特務講義。哀哉無辜青年，不知何時能離此黑暗牢獄！

除機關外，聽說街頭巷外，也有特務密佈，除特殊者外，還有接替辦法，卽一個特務監視一人走完一條街後，第二條街還有第二個特務接下去監視。各條街上都有特務輪流接替監視，使你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據可靠報告，我也承蒙他們不棄，也派有特殊的特務監視。但是後來似乎並沒有收到多大如他們所希望的效果。依犧牲青年的成例，他們所希望的效果，最好應該是發現我有越軌或違法的重大的罪狀，作爲他們的藉口，那末一刀兩斷，一命歸陰，還落得個法治精神的美名。但在事實上我並沒有越軌或違法的任何罪狀，所以特殊的特務儘管對我一天跟到晚，從這條街跟到那條街，也跟不出什麼來！我不是沒有活動。我對於國家民族的血沒有冷，是滾燙着的，無論在國民參政會中，（遇到舉行大會的時期）在國民參政會外，抗日各黨派（其中亦有主持正義的無黨無派的人士，代表總數約十六七人，都是國民參政員，爲着調解國共摩擦（因國共摩擦最尖銳，尤其是軍事摩擦，如處理不

當，或不幸擴大，勢必妨礙團結抗戰建國），我無次不參加，無次不追隨諸前輩之後，竭盡心力，不辭勞瘁，以期有所救濟。（因所調解者爲國共摩擦問題，故國共兩方面都不直接參加，直接參加者僅爲國共以外的其他抗日各黨派，惟有所建議，必以書函詳述，由全體負責者簽字，推代表持與國民黨的蔣先生及中共在渝代表人周恩來先生徵求同意。）

熱心調解國共摩擦的國民參政員，不乏其人，抗日各黨派的領導人及無黨無派的公正人士都有，這原無足爲怪，站在國家民族利益的立場，誰不虔誠希望全國團結禦侮？但是我一參加調解國共摩擦，國民黨的反動派便振振有詞，說國民黨請我做參政員，我卻幫助共產黨，他們好像把參政員看做豢走狗似的，一旦豢養，便感恩圖報，助桀爲惡，便當閉着眼睛幫助他們「消滅異黨」，置國家民族的前途於不顧！他們自己也許這樣做慣了！爲什麼不略爲張開眼睛把人看看清楚？說得出這樣骯髒的話，聽了令人作三日嘔！記下來都汚了我的筆！

我的行爲是光明磊落的，與人以共見的；我的參加調解國共摩擦是和其他十六七位國民參政員共同進行的。在戰時首都，要以調解國共摩擦爲罪名而加以逮捕是不可能

的，要尋覓其他罪名也無隙可乘，於是發生一件奇聞，一件奇事。

奇聞是：有一天有一位在軍委會政治部第×廳任事的某女士很憂慮地跑來見我，說他偷聽到第×廳會議商討如何處理我，決定最妥善的辦法是乘我到附近鄉間偏僻地方閒遊的時候，裝做匪徒出來搶劫把他刺死。某女士原在文化界服務，爲人很忠實，爲很多朋友所知道，她再三叮囑而別。我平日少閒，因此也很少到「鄉間偏僻地方閒遊」，況且得到某女士的好意「叮囑」，所以直到今天未被「搶劫」，更未「刺死」。

奇事是：當一九四〇年秋天，戰時首都各軍事及公安機關忽接到軍委會參謀總長何應欽氏通令，謂據報我和沈鈞儒沙千里諸先生將於七七在首都暴動，如不成則再於雙十暴動，愼爲防範云云，（誰被誣爲罪魁，已記不清，尋常好事應該推年高德劭的沈老先生，罪魁未便亦不忍瞎推，就算是鄙人被誣可也！）我們三個人親往質問何氏，他親自接見，說得非常好聽，他說：「我們深信諸位先生決不會這樣，這一定是漢奸離間之策！」他話雖如此說，但後來還是一而再發出同樣的通令！（因有些機關裏的熟朋友通知我們。關於這件事在拙著抗戰以來有較詳敍述。）

那「奇聞」的用意很淺顯，但要自投羅網，否則無從下手。那奇事卻存心更辣，暴

動之罪，非身首異處不可，豈不一了百了！我和沈先生都是奔走呼號團結最起勁的人，在反動派認為應該身首異處，猶可說也，無緣無故被個沙先生，其先莫名其妙，後來經熟悉「內幕」者道破，說CC派要把英國人愛黎那裏所慘淡經營的生產合作社搶過來，沙先生是愛黎最得力的一位助手，所以也想請他身首異處。

空氣既然放出，後來但聞雷聲響，不見雨下來，頗可詫異，想來想去，大概不會替我們三個人的身首設想，最合理的邏輯，還是因為替他們自己的利益設想。也許有人替他們想，這幾個人究竟在社會上多做幾年事，知道的人較多，不如青年那樣容易欺侮，也許將來易發難收。這只是我的猜想，當然還不是事實，事實是說我要暴動，要藉此砍我的腦袋。

特殊的特務也許沒有看見我有什麼武裝，所以倒並沒有說我要暴動，甚至看得單調，後來我溜往香港，他竟沒有發覺，他自己反而因此被特務頭兒關了起來。

其實他也怪可憐，後來聽說他在監視我的時候，每天只有兩塊錢的生活費，在他也許不夠用，這也許使他對於特工的情緒低落。聽說特務要有特殊的報告才有特賞。這在我，他也不易得。說我要暴動，這也許可算是很特殊的能，但已被高高在上的參謀總長

何應欽氏搶先報去了，不但報一次，他自己否認之後，還一而再再而三地報去了，那裏輪得到他呢？

在政治「曲線」加速往下降的情況下，「三擦」的不幸現象也加速增劇起來。關於「三擦」中的軍事摩擦和人事摩擦，上面都已大略地談過，現在想再略談「三擦」中的文化摩擦。

所謂文化，儘管在各專家有或詳或略的定義，但就具體的表現而論，主要的是在言論出版及教育各部門。言論有的是口頭的，如演講，談話，座談，及討論會之類；有的是寫出來的，如報紙雜誌上的言論等等。出版則屬於日報，期刊，雜誌，以及書籍。教育則大概就狹義說，指學校教育，在學校中教師所教授，青年學生所研究的都是。這只是就事實上大概提出來談談，這幾方面當然並沒有嚴格不可逾越的界限，例如一個學校請校外的人來校演講，這是演講，同時也是教育，因爲它含有教育的意義。就廣義說，言論出版也含有教育的效用。學校中除講授外，也有課內外讀物及學校的印刷品出版物等等。總之，一般地說來，所謂文化摩擦，最具體的表現，主要的是在言論界，（尤其

是日報及期刊上的言論，）出版界，及教育界。

我在上面曾經說過，「三擦」往往有互相的關係。前方的軍事摩擦，雖是限於國共兩黨的軍事摩擦，可能發展其影響於大後方的人事摩擦，並不限於國共兩黨，而是侵入於比較有力量的其他抗日各黨派。關於這一點，我在前面曾經談及國共以外的青年黨及救國會的故事。講到文化摩擦，也有相類的情形，最顯著的是皖南事變發生後，當局對於文化摩擦的變本加厲。該事發生後，國共兩黨的機關報處於對立的地位很是顯然的，一方面是新華日報，一方面是中央日報及掃蕩報（中央日報算是國民黨的機關報，掃蕩報算是軍委會政治部的機關報。）一方面在極艱苦的環境中努力奮鬥，要把事實眞相及眞是非表白於世，以求公判；一方面憑藉執政黨的便利，運用審查機關及軍警憲兵作壓迫工具。最有趣的是警察憲兵在大街上亂打亂捕售賣新華日報的無辜小販。後來自己也覺得在戰時首都，國際觀瞻所繫，究竟不大方便，特妙想天開，僱用小流氓乃至小乞丐無緣無故隨處打這樣無辜小販的耳光，受侮反抗大概是人類天理，當然引起吵鬧，於是警察或憲兵出來裝做彈壓，把他們一同捉到官裏去，不管三七二十一，所有報紙全部沒收！這樣既可不致有礙瞻觀（？），又可達到目的。但是事實終究是事實，很難久

在隱瞞之中，不但你遇着中國的新聞記者，他們可以幽默而沉痛地告訴你一切，即偶而住在國際宣傳處的 Press House（也許可譯爲「記者之家」）外國訪員，他們也爲笑眯眯地低聲告訴你實際是什麽一回事。

天下事最難的也許莫過於壓抑正確的消息或言論。事有湊巧，擁護中國抗戰的中國國民，固然都怕內戰又要發生，以致妨礙團結禦侮，住在 Press House 的外國駐華訪員（尤其是英美，蘇聯記者有自己住所，德國除外）爲着他們本國的利益，也希望中國能團結抗住日本，所以對此類消息，十分注意，忙於探聽。新華日報於克服種種困難之後，把周恩來先生簽名蓋章負責寫出的「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及「向江南爲國殉難者致哀」幾個大字刻出登載之後，外國記者份子要譯發電報，仍被封鎖，剛巧他們裏面有人赴港，偷帶赴港發電，引起外國的公正友人及僑胞的急電飛來，希望中國仍能化險爲夷，爲國家得到最後勝利。聽說僑胞各團體來電總在千封以上，這使當局不得不稍稍有所顧忌，才能使事態不致再形擴大，僑胞對於祖國的關懷和急難時的貢獻，實在值得我們欽敬。

但是這一部分（關於國共兩黨）的文化摩擦卻不因此就算停止，新華日報排字工人

有幾十位被特老（特務老爺的簡稱，這名詞不敢說有創造精神，似尙順口！）綁去，至於郵政的暗中抵制！憲兵的暗中搗亂，亦不可勝說，我在這裏只是因爲這一部分的文化摩擦是政治「曲線」下降後「三擦」中的一部分現象，所以連帶談判，眞是略之又略，其詳有待於將來的中國史家，其實由前方的軍事摩擦而殃及後方的文化摩擦，可說是整個的，並不限於國共兩黨而已，皖南事變發生後，重慶中間層的日報言論有過二三星期的最困難最緊張的時期，便是一例。

皖南事變發生後，政府鄭重提出軍令政令之必須服從。國民黨的機關報要做的事很簡單，大罵一頓之後，將「漢奸」的帽子強行戴在對方的頭上。中間層的日報也有好幾家，他們的「腦亮」卻不能這樣簡單，而在國民黨領導下的政府環境中，又覺難說老實話，於是大家在這樣重要事件發生之後，索性有好幾天在社論裏一字不提！但是他們終難毖過難關，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負責人着了慌，把各報館的主筆先生分別請來詳加勸導，指示他們這篇文章應該這樣這樣做，那樣那樣說，大有以國文教師自任之概！有的主筆先生回館之後，勉強胡謅一篇敷衍敷衍，但是第二天又被請去，指出他說得不夠，甚至和宣傳部負責人原來的指示不符，希望他再來一下！有的主筆先生只好哭喪着

臉再勉強來它一下，有的倔強些的，老實置之不理，結果受到嚴重的警告。有的主筆再挨過幾天，被電話催得沒有辦法，情急智生，特來一篇不痛不癢的短評，登在報的末端，這當然大動了指示者的肝火，叫去大罵一頓，說叫你做長篇社論，指示得那樣詳細，你卻做了一篇三言兩語登在使人尋不着的尾巴上！再不識抬舉，那只有請他關門大吉！有一家報請老成持重的黃任之先生寫一篇，黃先生很費苦心寫了一篇顧全大局而又給國民黨十足面子的大著，可是他文章裏說的幾句公道話卻被檢查員删得一乾二淨。

總之那二三星期的重慶新聞界可謂在風雨飄搖之中，偶然遇到新聞界的朋友，他們總是搖頭歎息，把這件「新聞背後的新聞」做談資。

我對於皖南事件並不否認在表面上看來，其中含有軍令政令的因素，因為新四軍是歸軍委會指揮，在國民政府抗戰國策下作戰，由軍委會發出的命令是軍令，由國民政府發出的命令是政令，這是常識，但是在實質上我們卻不能否認其為黨派鬬爭的問題，因為在事實上新四軍是承襲有中共的傳統，軍委會及國民政府也在事實上是由執政的國民黨一黨所主持的。我們要解決問題，必須面對事實，不能以軍令政令幾個表面上的名詞抹煞問題的眞實內容，而不從根本上加強民主政治，鞏固抗日黨派的精誠團結與合作。

我有一篇文章很婉轉地表達我的這種態度，我自信是很持平的，原擬登在全民抗戰週刊上面，但是全文被審查會扣留，在那期週刊上的社論地位留下一個大空白——開個大天窗。

關於皖南事件的詳細經過及眞相，非本文範圍所及，在這裏只是指出軍事摩擦和文化摩擦的相互關係，略談一些作爲一例而已，但還有一件有關的小事卻很有重要的意義，値得附帶一提的。有一位我所信任的江蘇同鄉老前輩告訴我，說皖南事件發生後，顧祝同氏曾親到重慶召集一個江蘇同鄉談話會，參加的是在戰時首都的江蘇重要士紳，他也被邀請。他說顧氏對他們報告，老實說原定計劃是要消滅新四軍，後來未能成功，竟被跑到蘇北，很對不起云云。這裏面不僅是軍令政令問題，而確含有黨派問題，是顯而易見的。根本解決的辦法是要努力實行民主政治，各抗日黨派都在民主政府之下和衷共濟，同心協力，爲國家民族前途的光明，爲全國大多數民衆的福利，而共同奮鬭。這一點是根本解決中國政治的核心問題，以後有機會還要談到，在這裏只是要指出：我們澈底明白了皖南事件的眞相，便知道只是用軍令政令的表面名詞來抹煞一切，當時言論界並不以這種掩耳盜鈴的態度爲然，不是沒有理由的，但卻因此引起當時的文化摩擦，

實在是很不幸的事情。就表面上看來，上述的文化摩擦是由軍事摩擦波及的，但是如果進一步作稍稍深刻的分析研究，便知道其根本來源不是僅僅來自國共兩黨的關係問題，也不是僅僅來自抗日各黨派的關係問題，而是來自有關國家前途的基本的政治問題。——具體說來，就是民主與反民主的鬭爭。

軍事摩擦可能波及或加劇文化摩擦，但文化摩擦當然不只是由於軍事摩擦，可能由於在基本的政治問題之下對於各種重要問題的態度。例如上面談過的憲政運動，抗日各黨派認為不實行憲政則已，既實行憲政，必須注意提高民權，實行合於抗戰建國需要的憲法（卽不應死守已經過時的不合時代需要的憲法草案及國民大會組織法選舉法等。）而且應把憲政運動和民衆運動打成一片；一方面使政府的本質眞能民主化，一方面使人民眞有參政的機會。但是國民黨的某些人卻只要敷衍表面，實際上仍想維持一黨專政的局面，而對於民衆運動，更好像驚弓之鳥，所以說只要少數學者在房間裏研究研究就得了！

因為對於這個重要問題有這樣的不同的態度，於是在發表言論，乃至發表文章各方

面，碰來碰去都不免摩擦。本文不是研究憲政問題，所以關於憲政問題本身，不能多所論述。我在這裏只想指出一點，就是在國民參政會中儘管通過實施憲政的提案，而在這些提案之中，除了在野的各抗日黨派及無黨無派的公正人士外，執政的國民黨儘管也有實施憲政提案在內，但是有一件很有奇趣的事實，卽你如有工夫把當時國民黨的言論（包括日報定期刊及小册子等，）一讀，那在實際上幾乎是完全反對憲政的，和民間的言論幾乎是處於敵對的地位，好像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陣營似的！

例如民間言論講到民權，很自然地會講到民主政治中人民享受的民權而且已成爲各民主國憲法常調的所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等等自由權利。這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中亦曾經列爲專條，原屬中山先生遺教中的一部分，可爲國民黨黨史上增加光輝的。但是民權自由的「自由」兩個字卻嚇壞了反民主的先生們。國民黨中央黨部所出的關於憲政的小册子，開宗明義第一章，一開始就用四號大字把中山先生「反對自由」的話全部分印出，好像暗示國父也和他們一樣，一向是在「反對自由」的！其實中山先生所反對的是「一盤散沙」的自由，絕對不是民主政治中的民權自由，這是有中山全書原文可覆按，不是我所創造的。我們主張民主政治，誰也不會提倡「一盤散沙」的自由！

誰也知道民主政治所爭取的是有組織的合於法治精神的民權自由！這並不是什麽高深的政治學，只是常之又常的常識。但是國民黨的機關報和刊物卻用此大駡民主政治的提倡者，不惜一引再引三引四引！他們根本沒有想到反對「一盤散沙」的自由是一件事，反對民主政治中的民權自由又是一件事！但是反民主者卻把這兩件事扯爲一談，視爲無上法寶，呶呶不休，不但在重慶憲政運動時期努力「表演」，後來在香港的國民黨機關報——國民日報——以及用盡陰謀掠奪到手後的星島日報上，仍把這個「法寶」搬出來大駡民主政治運動。在我第四次流亡到香港後，又看到這個「名劇」「演出」，有一天遇着一位剛到港的國民黨參政員某君，我們私人友誼不錯，承他來訪問，我慨然問他，國父遺教中積極提倡民權可資發揮光大之處不少，何必如此歪曲遺教，令人齒冷，小册子作俑於前，機關報呶呶於後，何苦來！他回答得很妙，他說：「他們不如此解釋遺教，如何解釋他們當前的行動？」我的憤慨，在實際上不僅爲着民主政治運動，也是出於愛護國民黨及中山先生，也許這一點感動了這位國民黨朋友，所以給我以如此坦白直爽的答覆。所可惜的：這也只是他在房間裏私人談話中的態度，出去之後，他還不是同流合汚了，加入反民主者的行列中一同搖旗吶喊？

關於後來在香港的時候，民主與反民主的激烈鬬爭，這是後話，還待後敍，在這裏只是因爲談起在重慶憲政運動中國民黨的機關報言論一致反民主的奇怪現象，附帶涉及。現在言歸正傳，還是要回到在重慶憲政運動中「文化摩擦」的奇形怪狀。

因軍事摩擦問題而引起文化摩擦，這在「摩擦專家」隆盛的時代，似乎多少還是意中事；可是因憲政運動而也要引起文化摩擦，却不免有些希奇！

在國民參政會中一致通過實施憲政提案，却在國民黨中有人大發其反對民權自由的高論，這已足令人詫異，但是既稱爲「實施憲政」，關於「實施」想來總不致和民間言論發生爭執罷！但是在提案一致通過以後，却有一位國民黨參政員某先生在國民黨機關報上發表偉論，認爲依中山先生遺教，有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之分，現在訓政未畢，而且抗戰期間尙在軍政時期，所以憲法儘管研究，至於「實施」，那要等到何時，尙不得而知！（這篇名著原文不在手邊，只能述其大意。）於是「黨」的言論紛紛提出三個時期的重要性，大有篤守「遺教」的信徒愈多，民主政治的前途愈無希望之概！這樣，「官論」與「民論」之間又引起了不少的波瀾。其實中山先生預定訓政爲六年，現在訓了一二十年，勢非永訓不可！中山先生所指的軍政時期，是當時革命政府僞處廣州，北

洋軍閥橫行各地，實施憲政，非俟打倒軍閥，無從着手，現在爲對外戰爭，加強民主，正所以加強動員，形勢迥異，豈能混爲一談。

這種「黨」的偉論，無異於無形中把國民參政會中所一致通過的實施憲政提案根本取消！國民參政會雖漸漸只具形式，最近已成爲CC派所操縱的御用機關，但在當時，尚有幾分生氣，在野的各抗日黨派對此當然不能默無一言，該會議長卽爲國民黨的領袖（總裁）蔣先生，參政員有機會見到議長時，便提出疑問，蔣議長大概也覺得太說不過去，於是由他發表談話，申述根據總理遺教，三個時期不必拘泥。但是蔣議長的申述是一事，國民黨內定的政策又是一件事。從此以後，「黨」的言論雖不再喋喋於三個時期，但卻一致認爲民主與抗戰是不能同時並行的，民主與抗戰是不相容的，民間言論卻認爲民主是鞏固團結，加強民衆動員，及革新政治的鎖鑰。所以關於這方面的「文化摩擦」仍然是有着遠大的前途！我們看到國民黨最近十一中全會決定抗戰結束一年後才實施憲政，可見民主與抗戰不相容的謬論仍是某些人的成見。

所謂文化摩擦，如果只是口頭辯論，文字爭論，那眞理愈辯愈明，我們不但不反

對，反而可以歡迎，但事實卻不是這樣。前面所述警察憲兵特老爺對於壓迫文化的行爲，已是證明一斑。眞理愈辯愈明；在相反方面，違反眞理的言論行爲也最懼怕公開的辯論和研究。憲政座談會之所以受到國民黨某些人的極端厭惡，理由就在此；提倡團結與民主的言論所以受到某些人同樣的極端厭惡，理由也就在此。重慶各界憲政座談會由各界熱心人士要求在野各抗日黨派國民參政員發起並主持其事，宗旨正大，行爲光明，而且在野各抗日黨派爲着進行順利並與國民黨合作起見，曾想種種方法拉一位國民黨參政員參加。其先拉不到，拉這個不來，拉那個不願，後來想盡方法拉到一個，也像小學生時常「逃課」一樣，時來時不來。最後由「黨」的「領導」，用打手若干人搗亂會場，鬧得烏煙瘴氣，詳情我曾在拙著抗戰以來一書述及，現在不多說了。

「文化摩擦」這個名詞裏有「文化」兩字，好像怪斯文似的，其實文化摩擦的結果不但可使被壓迫者失學失業，甚至失去生命。一個湖南學生因偶在抽屜內被發現一張新華日報，被立刻剝去冬季制服，驅逐出校，便是一例。又像前面談過的鄭代鞏因創辦戰時青年辦得發達，被特老「賞識」，認爲是「異黨份子」而被綁，又是一例；這倒不是僅僅因爲辦得發達，（雖則這一點也是受注意的因素之一），而尤其主要的還是其中的內

容是進步青年的進步意見，例如對於當前的國事問題，擁護團結必然要引起摩擦專家的肝火，主張民主必然要引起反民主者的嫉視。至於研究到青年切身的種種問題，只要是進步的主張，都不免與頑固派反動派的高見格格不入。頑固派反動派的老爺們自己知道要在思想上領導青年幾乎是不可能，這並不是有什麼敢於阻止他們在思想上領導青年，卻是因爲他們自己領導不起來。於是他們只得另闢途徑，把進步的青年刊物主持「綁」去！他們說他辦事很能幹，所可惜的就是「異黨份子」！其實凡是進步份子都有「異黨份子」的嫌疑，因爲他不知道跟着閉着眼睛破壞團結，反對民主！這樣「不識事務」的進步青年，在頑固派反動派的老爺們看來，決定槍決，眞是千活該萬活該的事情！

這些例子，也可以說是由文化摩擦牽連到人事摩擦。這二「擦」是時常可以碰在一起的。在四川綦江訓練班演出的許多無辜青年慘受酷刑，死於非命，是教育界方面文化摩擦牽連到人事摩擦的一種較大規模的例子，其詳亦見拙著抗戰以來一書中，此書恕不贅述了。此外學校教員上因不能如頑固派反動派老爺們之意，發揮「赤色帝國主義」的神祕理論，致被打破飯碗（此中有一位親來詳細告訴我一切；）成都某大學有一個大學生因被校內武裝的三青團某「健將」所「賞識」認爲他的「腦殼」有問題，於深夜被叫到

校舍附近，嚴厲詰問幾句，乒乓一聲，一命斷送，同學側目，莫敢誰何！（這是我第五次流亡經過廣東某縣時，有華僑青年某君曾在該校肄業，僅一年大學卽可畢業，看來形勢每況愈下，情願半途輟學去做生意，由家裏出些資本，在粵港一帶經營運輸貨物，親口告訴我他所親耳聽到的這個故事，他在校內某個深夜，親耳聽到那位「健將」怎樣叫那個被暗殺的同學出去，怎樣問答，怎樣發出槍聲，那個無辜同學怎樣慘呼而倒。）這類奇事慘劇，都構成了「文化摩擦史」上令人憤慨無已的一頁。

這樣看來，像特派若干打手搗亂憲政座談會會場，僅將聽衆從此驚散，未把十幾個各黨派的參政員（其中有一位被強拉列席的國民黨參政員李中襄先生，可謂兩面做人難，他是我的老友，我很同情他的苦境！）打得頭破血流，或乘便送掉幾條老命（其中有好幾位滿臉長鬚年高德劭的老輩，）可謂「優待」之至；又像分別延請各報的主筆先生到黨部辦公室「面授機宜」，指示「文章作法」，也可謂「客氣」之至了！最可慘痛的當然要輪到許多既無「參政」之虛名，又無「主筆」之職位的純潔天眞的青年！每念及此，不勝悲憤！

卽像區區這樣一個「儍子」，不過想對進步文化貢獻一點小小力量，也受盡頑固派

反動派老爺們的青睞，既不死於重慶野外偏僻之地（參證前述軍委會政治部某君的熱心報告，）又不死於「暴動」禍首之列（參證前述某參謀總長的再三通令），如今仍得苟延殘喘，勉強呼吸於人間，在病榻上於病苦中憤然持筆寫此患難餘生記，仍與黑暗勢力作殊死戰，也可謂萬分僥倖了！

文化摩擦並不是限於文化界一隅的現象（所謂文化界，主要地包括新聞界，出版界，教育界，）而是整個政治「曲線」下降中全部「逆流」現象中的一部分。（「逆流」這個名詞，用來形容整個政治「曲線」下降中的全部狀態，頗爲簡明可取，雖則頑固派反動派老爺們聽到這個名詞大爲頭痛！）這一點很爲重要，因爲必從整個政治「逆流」中看文化摩擦，（看軍事摩擦或人事摩擦也一樣，這裏不過專就文化摩擦而已，）然後才看得出文化摩擦癥結所在，然後才能明白文化摩擦的根源也是來自有關中國前途的基本政治問題，然後「文化摩擦」這個問題才能獲得合理的解決。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才能夠進一步指出：所謂文化摩擦，除一方面與其他「二擦」（軍事摩擦與人事摩擦）常可以發生連帶關係之外，另一方面，就它本身說，是中國整

個黑暗勢力所要盡力保存的落伍文化與中國整個光明力量所要努力發揮光大的進步文化的鬬爭。所以我們如看到一個進步的報館或其主持人遭難，以爲這只是這個特殊的報館或主持人與頑固派反動派之間的糾紛，這便是大錯誤；我們如看到一個進步的學校或其主持人遭難，以爲這只是這個特殊的學校或主持人與頑固派反動派之間的糾紛，這也是大錯誤；同樣地我們如看到一個出版機關或其主持人遭難，以爲這只是這個特殊的出版機關或主持人與頑固派反動派之間的糾紛，這也是大錯誤。卽作爲個人的一個進步的作家或文化工作者，我們如看到他的遭難，以爲這只是這一個特殊的個人和頑固派反動派之間的糾紛，那也是大錯誤。爲什麼呢？因爲無論是進步的報館，或是進步的學校，或是進步的出版機關，或是一個進步的作家或文化工作者，他們的工作目標與成果，都是整個進步文化的一部分。爲着一個進步文化機關而努力奮鬬——無論是報館，學校，出版機關，乃至學術團體——爲着進步文化的工作而努力奮鬬，都是爲着整個進步文化而努力奮鬬。

文化政策是整個政治政策的一個重要部分。進步的政治政策才能產生進步的文化政策，也只有進步的文化政策，才能與進步的政治政策相配合；就文化政策的偉大効能而

論，我們也可以說進步的文化政策是進步的政治政策的先導，是進步的政治政策所以成功的一個要素。頑固派反動派所以痛恨進步文化，也因爲進步文化與他們的頑固派反動派政治政策不相容，是他們的頑固的反動的政治政策的莫大障礙，所以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摧殘蹂躪，不遺餘力。在政治「逆流」的漩渦中，文化摩擦所以發生，進步文化所以遭到空前的災難，根本原因也就在此。

但是我們爲着國家民族的光明前途，必須始終堅守進步文化的崗位，與黑暗勢力奮鬭到底。什麽是進步文化？請於下章敍述「進步文化的遭難」時候，附帶提出來研究。

第三章　進步文化的遭難

在政治「曲線」往下降的不幸情況下，國民黨的頑固派反動派老爺們，忍心將中山先生所留給中國最可寶貴的遺產三民主義拋諸九霄雲外，而獨津津有味於禍國殃民的「三擦主義」的橫衝直撞。所謂「三擦」，即在前面曾經大略談過的軍事摩擦，人事摩擦和文化摩擦。無論在「三擦」中的那一「擦」，在頑固派反動派方面都是要用倒退來消滅進步：在軍事摩擦中，他們所要消滅的是進步的軍隊；在人事摩擦中，他們所要消滅的是進步的人才；在文化摩擦中，他們所要消滅的是進步的文化。我是一個文化工作者，進步文化的遭難，於我當然要發生更直接的沈痛的感覺，是使我陷入苦難的更直接的原因。

首先我們要問什麼是進步文化？進步文化和倒退文化有什麼區別？黑暗勢力為什麼要殘酷地摧殘進步文化？

我和四五百工作同志所慘淡經營艱苦支持的文化機關是全國同胞及海外千萬僑胞所共知的生活書店。我們對於幹部教育非常注意，每星期有油印的店務通信一小册，分發到布滿全國各重要地點五十餘處分店同人公閱，我在每星期的店務通信裏都寫有一篇文章，對全體同人指示有關文化的重要問題及工作途徑等等，我記得其中有一篇是專門解釋進步文化的內容。進步文化須與中國當前的進步時代的實際需要相配合；中國當前進步時代的實際需要，最扼要地說來是團結，抗戰，和民主，所以擁護團結，抗戰，和民主的文化是進步文化，反對或破壞團結，抗戰，和民主的文化是倒退文化。團結是指全國各黨派各階層都在抗戰建國的共同目標之下，精誠團結起來，不再有內戰或摩擦的不幸現象發生，一切力量對外則集中於爭取抗戰勝利，對內則集中於實現民主政治。抗戰是民族解放必須經過的一個過程，抗戰的發動是建立在團結基礎之上，是衆所共睹的事實，抗戰力量的加強和抗戰最後勝利的獲得，也必須建立在團結基礎之上。民主政治本來是我們建立眞正民國的前提，而在抗戰期間尤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爲必須以民主的方式和精神來共同推進國事，才能鞏固團結；也必須以民主政治來發動民衆力量，革新政治，才能加強民衆動員；鞏固團結，加強民衆力量和動員，才能增強抗戰力量，在事

實上做到愈戰愈強，達到抗戰最後勝利的目的，同時也達到建立眞正民國的目的。根據這種基本的認識，本店出版的書報乃至代銷的書報，都須注意是否能夠促進團結，鞏固團結；是否能夠加強抗戰，堅持抗戰；是否能夠推進民主，實現民主。在相反方面，我們絕對不但不製造或煽動摩擦，而且要盡力消除或反對摩擦；我們絕對主張徹底抗戰，反對妥協投降；我們要求實現眞正的民主政治，反對法西斯，反對一黨專政，反對新專制主義，反對掛羊頭賣狗肉的有名無實或徒有形式而缺乏精神的「民主」政治。合於這個標準的便是進步文化，因爲他能配合中國當前進步時代的實際需要；違背這個標準的便是倒退文化，因爲它把中國往後拉，它使中國人民大衆陷入水深火熱的苦難中。除上述三點外，我還可以加上這樣的幾句話：我們所努力的是爲大衆謀福利的文化，而不是爲少數人謀私利的文化，所以在思想或理論上我們積極注重於大衆有利的思想或理論，反對爲少數人保持私利的欺騙或麻醉大衆的思想或理論。

中國的文化事業。大概說來，有這樣的兩大部分：一部分是與政黨有關係的，一部分是沒有政黨關係的民衆的文化事業。與政黨有關係的文化事業，其本質是倒退呢？還是進步？這要看他所屬的政黨在實際上所採用或所主張的政策是倒退還是進步。就中國

目前說，在野的各抗日黨派對外都主張團結抗戰，反對發生內戰或摩擦，對內都主張實行民主，反對一黨專政，（最有趣的是對遠景都主張社會主義，詳見拙著抗戰以來一書）這都能配合中國當時進步時代的實際需要，在政策上可說是進步的，所以他們所主持的文化事業，都可說是在進步文化範圍以內。這裏面在主張上當然也還有程度之差，在事業規模及力量上也還有大小的區別，因此在政治逆流之下，雖同受頑固派反動派的壓迫，其尖銳或慘酷的程度也各有程度上的差異。（其間還有暫時失足離開正確立足點的，例如國社黨的張君勱先生在抗戰初年曾經有一封公開的信被頑固派反動派所利用，但後來張先生亦自知誤會，在野各抗日黨派們團結如初）。至於與黨派無關係的民辦的文化事業，如就出版業說，其間亦略有新舊之分，舊的向來偏重於教科書的出版，在基本知識上雖也佔相當重要的地位，但與當前進步時代的實際運動之接觸較少，就這一點說，所含的時代的進步性比較地有限。新的偏重於課餘讀物及一班讀物的出版，與當前進步時代的實際運動較有密切的接觸，因此所含的時代的進步性也比較地濃厚。

中國政黨最大的要推執政的國民黨。國民黨承受中山先生最可寶貴的遺產三民主義。中山先生雖曾在序文中勖勉國人繼續研究，但其中實含有豐富的進步性，國民黨中

號稱中山先生的信徒們，如能發揮光大遺教的進步性，採用進步的政策，使國民黨不但領導全國抗戰，而且領導全國實施加強抗戰加速抗戰勝利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等方面的進步政策，那在進步文化上必能發生堅強領導的實效，是不成問題的。但是現在如何？CC派所把持包辦的教育之「特務化」，摧殘青年，壓迫思想，極人事摩擦和文化摩擦的能事，已成爲衆所週知的深可痛心的公開的事實。至於出版物，發揮光大三民主義的良著固遍覓不見，卽有二三定期刊吧，「潑婦罵街」外無內容，而且罵的內容，千篇一律，好像天天聽潑婦駡人「殺千刀」，貧乏之至，無味已極，這種「文化」，我再無以名之，名之曰「殺千刀文化」！令人看了幾句卽不再看下去，因爲已經知道下面駡的是怎樣的一套！千語萬語，歸結不外兩件「大事」：破壞團結，反對民主！這樣的出版物，就是廣刊分送，也引不起讀者注意，要在進步文化方面發生堅强領導的實效，更無從說起。我在上面已經提及，根據中山先生寶貴遺教三民主義所含的豐富的進步性，原可在進步文化上建立堅強的領導，現在頑固派反動派卻無視三民主義所含的進步性而盡力於「三擦主義」，閉目掩耳，樂此不疲，使中山先生所手創的具有過去光榮歷史的黨所原有的進步文化領導地位陷入倒退文化的深淵，實在是一件深可痛惜的事情。

倒退文化和進步文化競爭，結果必然是要着着失敗，頑固派反動派不自反省其失敗之所由來，而徒懷恨於進步文化的突飛猛進，以爲他們之所以着着失敗，是進步文化做了他們的障礙，於是發生一種幻想，以爲只須用全力消滅進步文化，便可達到他們「唯我獨尊」的目的，從此可以高枕而臥，從心所欲了。

由於這種幻想所生的結果，便是壓迫進步文化摧殘進步文化，於是才有進步文化遭難的不幸現象。

進步文化所包含的因素，我在上節已經談過。進步文化是有時代性的，我們在今日中國所提到的進步文化，當然要連繫到中國當前進步時代的實際需要。我和數百工作同志所共同努力的文化事業，以生活書店爲中心，只是全國進步文化中的一部分。但是在政治逆流中，整個進步文化遭受壓迫的情況下，這一部分所遭到的苦難尤爲殘酷，此中也有其獨特的原因。

在野各抗日黨派對於文化事業都各有其相當的經營。而其中的中共在其中心所在地的延安及其抗敵衞國的敵後根據地，固有其大規模的文化事業，卽在戰時首都，亦有其

日報雜誌的刊行，及書店的設立。除中共外，其他在野抗日政黨所辦的文化事業，規模都較小，如青年黨在成都有一種日報的刊行，此外有國論的刊行，國社黨有再生週刊的刊行，以前僅在香港有國家社會報爲其機關報；第三黨原有一種定期刊名民族解放行動，似時有時輟。職教派有國訊旬刊。村治派的梁漱溟先生到香港爲民主政團同盟創辦光明報時才有一定的言論機關，經常發表他的政見。（日本佔領香港後，當然停辦。）就上述各黨派而論，中共所主持的文化事業，顯然有較大的規模與廣大的力量，故在大後方文化摩擦尖銳的時候，所受的壓迫也很厲害，但以中共在堅強的組織上及進步的政治力量與進步的武裝力量上都可使頑固派反動派不得不有所顧忌。這一部分進步文化事業在後方所遭受的壓迫尙有其限度，理由便在此。其他黨派所辦的文化事業因規模較小，摩擦的機會雖亦常有，（例如成都的青年黨機關報就常與當地的黨部及檢查機關有激烈的鬬爭。）其發展或擴大亦常有其限度。故同爲進步文化範圍內的事業，頑固派反動派的壓迫或摧殘，卻每與對方事業的規模及力量成正比例，而像中共在政治上及武裝上有其進步的實力以作其進步文化的保障，那在在野各抗日黨派中卻算是例外。

現在要談到我和生活書店同人所支持的那部分進步文化事業。關於生活書店的組織

和管理，以及生活書店全體工作同志精神之所在，我在拙著事業管理與職業修養一書中論述頗詳，可供參考，我在這裏所要特別指出的，就是生活就組織上說，它是四五百工作同志在十六年長時期中（假定以生活週刊創辦於一九二五年爲始，至被摧殘到一九四〇年爲一段落，）血汗乃至血淚的結晶品，一步一步由極小規模而擴充起來，將所有收入盡用於事業的擴充與改進，而不是由任何政黨或政團出資創辦的；就這一點說，我可以毅然決然地說，生活書店是沒有黨派關係的民辦的文化事業。（除內部的四五百工作同志外，圍繞着生活書店熱心支持本店文化事業的無數的進步作家，以及海內外熱烈贊助本店文化事業的無數的讀者，對於本店的構成，當然也盡了很大的力量，是本店內部工作同志所永遠銘感與永遠引爲無限光榮的。）但是就精神上說，由於我是忠誠堅貞的愛國者，由於最大多數的工作同志都是熱烈誠摯的愛國青年，（在長期的過程及最大多數的集體力量中卽有一二例外或差一點的，亦不起任何作用，）這個文化機關在救國會成立以前，就和民族解放的偉大運動在實際上連在一起，自從一二九學生救國運動發生及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以後，生活書店所出版的定期刊，尤其是大衆生活，在事實上成爲全國救亡運動最主要的機關刊物。其他書籍雜誌，足供救亡運動參考者亦甚被社

會重視。至於團結，抗戰，民主，在救國會所提出的政綱中佔非常重要的位置，亦成爲進步文化的內容，生活書店卽爲進步文化機關，對於救國會政綱的熱誠擁護與努力倡導，固爲意中事：因此有人認生活書店是救國會派的文化機關。關於這一點，就救國的主張而論，我們用不着否認，而且我們數百同志所共同努力的這個文化機關，能在救亡運動中有所貢獻，正是我們深深覺得無上光榮的事情。

生活書店雖非救國會所出資創辦的，也不是在組織上直接隸屬於救國會的，但對於救國主張在原則上或精神上卻與救國會共鳴，具體說來，就是對於團結，抗戰，民主，的積極倡導與擁護是和救國會一致的，是和救國會同樣堅決的；這都是事實，我只是很坦白地把事實提它一提。事實勝雄辯，這樣明顯的事實，本來用不着再提，但是一則因爲談到文化事業機關與黨派有無關係的一般情形，有交代明白的必要；再則因爲國民黨的頑固派反動派不能以堂堂正正之旗，光明磊落地在文化事業上與人作工作的競賽，往往利用黨派鬬爭的藉口，周納陷害，掩人耳目，而在實際上只是壓迫進步文化事業，摧殘進步文化事業而已！如今把事實指出，愈使魑魅魍魎無所遁形於光天化日之下了！

（關於生活書店的組織及其構成歷史，和它的進步性也有關係，以後還要談到。）

我和數百工作同志所艱苦支持的這一部分的進步文化事業——中國整個進步文化事業的一部分——雖是與黨派沒有關係的民辦的文化事業，因為他的事業在本質上是進步文化事業，已足招頑固派的嫉視，必欲置之死地而後甘心。更加火上添油的是他的事業突飛猛進，力量宏偉，（至少在他們看來，雖則我們還覺得欿然不自足，）除中共外，其他在野的抗日黨派所主持的文化事業，在規模及力量上都比較地小，於是在頑固派反動派看來，這支堅強偉大的進步文化生力軍是他們的莫大障礙物。同時因為它除在救國主張上和救國會派共鳴外，在實際上也並不是任何黨派的機關，而只是與黨派沒有關係的民辦的文化事業，更說不到有什麼實際的政治力量和進步的武裝力量做保障，使頑固派反動派的鼠膽不得不於橫行之餘稍稍有所顧忌，所以除了法律保障和民眾同情之外，頑固派反動派可以違法蹂躪，任所欲為。法律在他們手裏，正如中央圖書雜誌審查會總務主任朱某所公然言稱：「我要怎樣就怎樣！」法律保障無從說起，民眾組織早在官化之列，真正的民眾同情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在短時期內，在表面上，是無法急速加以拯救的。這便是在政治逆流中，整個進步文化遭受壓迫的情況下，這一部分，進步文化所遭到的苦難尤為慘酷的獨特的原因。

講到生活書店發展的迅速，蓬勃的氣象，我不是在這裏寫生活書店歷史，無意作有系統的詳細的敍述；我在這裏只是要說明生活書店發展的迅速和氣象的蓬勃如何引起深刻的注意。如果他的規模小，力量小，所遭的苦難也許不致於這樣慘酷。

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戰發生以前，生活書店總店在上海，分店僅廣州及漢口兩處。全面抗戰爆發以後為適應抗戰期間全國同胞對於抗戰文化的迫切，本店特派高級幹部數十人分往內地各重要地點創設分店，由於負責幹部的艱苦奮鬥，業務更一日千里，異常發達，不到一年，全國分店已達五十餘處。一九三八年總店已移至漢口，負責主持營業的同事，為着使全國讀者便於就近購買所需書報起見，特將散處全國各地的五十餘處分店在一張地圖上用圓點註明，以此圖形在報頭刊登半版廣告，陸續在各報登出。不料有一天將這樣的廣告底稿送至國民黨的機關報掃蕩報接洽登載的時候，竟被無故拒絕！我們的那位同事深覺詫異，再三向該報廣告部探詢原因，據說是「上面」預先這樣囑咐的，後來又問他們，何以有這樣的囑咐，據說這個廣告有着政治作用！一個公開的合法的出版機關在報上登載分店地址的廣告，有什麼「政治作用」之可言？如果大家都承認當前的政治大目標應該是：堅持團結抗戰，實現民主政治，那麼這種進步文化機關愈發達，

於政治目標的加速達到，正有百利而無一害，爲什麼要拒絕它登載分店地址的廣告呢？這種奇異現象的解釋其實也很簡單，就在：那個時候，這個進步文化機關發展的迅速和氣象的蓬勃，已經嚇倒了國民黨中的某些頑固份子反動份子！不過那個時候的政治「曲線」還未迅速往下降，頑固派反動派還不敢十分放縱，只想盡力壓抑你的發展，未敢即下決心請你完全關門大吉罷了。

但是適應進步時代的進步文化的向前發展是不可能壓抑的，生活書店的事業仍然向前發展；最顯著的象徵是任何一個分店都擠滿着熱心讀者，自朝至暮，川流不息，清晨趕着開門，晚間難於關門，各地讀者熱烈的情緒是十分使人感奮的。

白健生先生（崇禧）的祕書某君有一次告訴我，說他有一天陪白先生在桂林乘汽車經過生活書店桂林分店的門口，人山人海，擁擠不堪，白先生以爲是什麼戲院的門口，無數觀衆，在那裏擁擠着爭先恐後地購買戲票！那位祕書聽了不禁笑了起來，說那是生活書店的門口，擁擠着的人們是要買書報，不是要買什麼戲票。白先生聽了爲之欣然，說這足見抗戰期間民衆文化的突飛猛進，眞是可喜的好現象！白先生當時脫口而出的這幾句話可以說是完全出於愛國的至誠。但是白先生沒有料到生活書店以後所以遭到頑固

派反動派的那樣殘酷的摧殘。這種「可喜的好現象」時常接觸到他們的眼簾，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進步文化的突飛猛進，雖有利的國家民族，雖有利於人民大衆，但卻是頑固派反動派的莫大的障礙物。他們是津津有味於軍事摩擦，人事摩擦和文化摩擦的，但是受過進步文化的薰陶的人卻不肯閉着眼睛，黑着良心讓他們牽着鼻子走。所以我們在進步文化遭受壓迫的時候，曾經聽到頑固派反動派宣稱進步文化的「罪狀」，這樣說道：許多青年一經看過新書報（指進步的書報）之後，頭腦就堅強得像石頭一樣，他們的言論（指頑固派反動派自己的言論，即他們所辦的「殺千刀文化」）無論如何再打不進去！因此他們對着進步文化的偉大力量發抖，於是忍心害理，加以摧殘。

如上述頑固派反動派所宣稱的進步文化的「罪狀」而果爲事實，我們不禁爲國家民族的光明前途慶幸！爲什麼呢？進步文化的當前主要目標是鞏固團結抗戰，促進民主政治，如今經過進步文化的努力，在中國青年中產生了盤千盤萬的團結抗戰的堅持者，產生了盤千盤萬的民主政治的擁護者，使「殺千刀文化」竟無所施其技，這不是爲國家民族的光明前途奠定了堅強不能動搖的基礎嗎？在這裏有一點須鄭重聲明的是：這是中國

整個進步文化所努力收獲的成果，而不是僅在中國整個進步文化中佔着一部分的生活書店的文化事業所獨能居功。但是頑固派反動派看到生活書店發展的迅速和氣象的蓬勃，卻把整千整萬的「堅強如石的進步頭腦」歸咎於生活書店，竟認爲要鏟除進步文化，發展他們自己的「殺千刀文化」，非從摧殘生活書店下手不可！

在政治「曲線」正往下降的情況下，在國民黨舉行的五中全會裏面，我們就聽說有人竟公開宣稱「生活書店的書籍，雖在鄉村僻壤，隨處可見，可謂無孔不入，其勢力實在可怕，而本黨的文化事業卻等於零，不能和他競爭，所以非根本消滅它不可！」（傳聞的大意如此，是參加該會的友人某君告訴我的。）頑固派反動派不自己想想所採用的文化政策是國人共棄的「殺千刀文化」，不自己想想自從國父中山先生去世以後，除已成著名漢奸的周佛海所著的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一本書，究竟出版了幾本甚至一本發揮總理遺教的鉅著，而但切齒痛恨於他人所辦的進步文化事業發展的迅速，以爲是自己所以不能發展的原因，中山先生在天有靈，眞不免要痛哭流涕長太息罷！

但是他們的「邏輯」無論如何不合理，而他們在政治不民主情況下是有權有勢的人，所以我和數百同志所辛勤努力的這部分的進步文化事業終於因爲在他們看來「其勢

力實在可怕，」而不免慘遭他們的毒手。我們這部分進步文化事業正在慘遭他們毒手的過程中，我在十分沈痛悲憤之中，要想拯救他的生命，也曾經奔走訪問在國民黨中腦子比較清醒的朋友，解釋我們事業的光明正大的立場與所遭受的摧殘的不合理。其中有一位是從前的報界前輩，他很坦白地告訴我說：「××兄，老實對你說，他們認為你們的文化事業的廣大發展，是他們的文化事業的障礙！」這位前輩的話，證實了上述五中全會中的傳說。其中還有一位是我從前的老同學而現在成為CC派特務的主持人，他很直率地告訴我說：「以這樣一個偉大力量的文化機關放在一個非本黨黨員的手裏，黨總是不能放心的！」他們儘管一位是報界前輩，一位是我的老同學，但是我為着擁護真理起見，不得不很抱歉地說明：立在國家民族利益的立場不問文化事業的內容是否有利國家民族，而只是驚其「廣大發展」，只是因為他的主持人不是本黨黨員，而即橫加摧殘，這裏所謂「他們」，無疑地是指頑固派反動派，這裏所謂「黨」無疑地不是指承襲中山先生革命傳統的整個的國民黨，也只是指頑固派反動派的卑鄙心理而已！

這些談話都足以證明：在整個進步文化遭受壓迫的情況之下，生活書店同人所努力的這部分的進步文化事業所以遭受到尤其殘酷的摧殘，是因為它的發展迅速，氣象蓬

勢，力量宏大，深入民間，尤其受到頑固派反動派的嫉視。這顯然不是什麼黨派鬥爭問題——他們所放的煙幕彈——而是進步文化與黑暗勢力的鬥爭。

頑固派反動派對於進步文化的壓迫，利用審查機關作威作福，原來是一條捷徑。關於重慶圖書雜誌審查會的種種無理取鬧，我在拙著抗戰以來一書中曾經舉出不少的事實，在這裏不再贅述。但雖將「黨派團結」改為「黨派統一」，（他們最怕最恨的是「團結」；但是把「黨派團結」一改而為「黨派統一」，在他們認為暗合「消滅異黨」的宗旨，得意之至！至於原著者的原意何在，在他們是「管他娘」！）將「婦女解放」改為「婦女復興」，（他們認為「解放」是中共專用的名詞，至於「婦女復興」如何可通，在他們是不加思索的。）鬧了不少笑話，但是無論如何，總不敢公然提出破壞團結反對民主的主張強行加入或改換進步作家的文章裏面去，於是另想妙法利用憲兵或「特老」的檢查作違法的破壞。例如我所主編的全民抗戰週刊，有一位文藝家在成都車站上閱看，就被憲兵干涉，說是不可以看。這位文藝家提出抗議，說後面明明印有重慶圖書審查會審查通過證的字樣，為什麼不可以看，他說儘管審查通過，仍不可以看！這位文

藝家很氣憤，一到重慶，就把這件事實告訴我們。還有一件奇怪的事件。有某先生對算學深有研究，對這門科學的興趣非常濃厚。他由重慶赴桂林，帶有一本生活書店出版的珠算速記法，途中特老檢查時問他爲什麽要看這本書，這位先生是一位忠厚長者，誠誠懇懇告訴這位特老，說他對研究算學特有興趣。特老怒目對他斥道：「不管你對研究算學有多少興趣，生活書店出版的書是不可以看的」。生活書店是在政府註册的合法的出版機關，這本書是經過政府審查機關通過的，你一看書名，就知道內容不會含有任何政治性，（卽含有政治性的書經過審查通過，亦應得到合法保障，）但是頑固派反動派對於進步文化機關的違法摧殘其合法的事業，其喪心病狂，可謂已達極點。

但是這在頑固派反動派仍未能滿足。全民抗戰週刊在停刊以前，每期數萬份，憲兵雖多，不可能跟隨每個讀者作違法的恫嚇。生活書店所出版的書籍更是汗牛充棟，不可勝數，卽就算學一門而論，特老雖狠亦不可跟隨每一位算學研究者而加以無理的干涉。於是頑固派反動派又另想妙法，「忍心害理，用更殘酷的手段，決定封店捕人，先將生活書店的各處分店盡行鏟除淨盡，企圖由此完全毀滅這一部分他們所認爲「其勢力可怕」，望着發抖的進步文化事業。

違法的卑鄙的毒計既定之後，一九三九年四月先從西安生活書店分店「開刀」，不但將店封閉，經理及職員逮捕，而且將所有生財用具搬移一空，形同刧掠。（後來看見赫然安置在他們新開的該地中國文化服務社分社中應用，可謂妙不可言，自居強盜，抑謙謙君子自居小偷，則未見聲明，不得而知）！自一九三九年四月起至年底，不到幾個月，由西安而天水，而南鄭，而宜昌，而萬縣，而沅陵，而吉安，而臨川，而南城，而贛州，而金華，而麗水，而立煌，而福州，而南平，而曲江，而梅縣，而蘭州，而衡陽，而貴陽，而桂林，而成都，而昆明等等五十餘處的生活書店分店負責人都遭受同樣的苦難。負經理責任的高級幹部被無辜逮捕的達四十餘人之多。我們四五百同事和無數進步作家及熱心讀者在十六七年的長時期中所培植的進步文化基礎，由於頑固派反動派的嫉視，嗾使各地黨部憑藉暴力（原來應該以法保障人民的警察或軍事機關），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違法摧殘，任意蹂躪，這不僅是一個進步文化機關的不幸，也是中國政治史上文化史上最汚穢的一頁！生活書店雖是由內部工作同志公推一人在政府經濟部註冊的商業機關，而內部的組織在實際上是採用合作社的原則，內部的管理是採用民主集中的原則，全體工作同志是受着他們自己所選舉出來的理事會的集體的領導，我是全體

工作同志所選舉出來的理事會主席，我對於這部分進步文化事業的總的責任是應該忠誠擔負起來的，所以我現在儘管在流離顛沛，病體危殆，九死一生之中，我只須一息尚存，必須秉筆直書，將頑固派反動派違法摧殘進步文化的殘酷而卑鄙的手段呈訴於海內外公正同胞之前，並把他們的罪狀宣告於天下後世。我並希望國民黨中腦子比較清楚對於中山先生遺教眞正忠實的人士趕快反省，採用進步的政策，不要縱任頑固派反動派橫行無忌，喪失國民黨所應有的光明前途。

當我們接到西安分店被封經理被捕的消息的時候，我們還以爲這也許只是偶然發生的地方事件，並沒有想到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已有人決定一網打盡的毒辣計劃。我便往國民黨中央黨部去訪問宣傳部長葉楚傖先生，承他出來晤談，副部長潘公展先生也參加談話。我說西安的事情既爲該處省黨部所發動，中央黨部應有所知，究竟爲着什麽原因而有這樣嚴重的處分，他們推說不知道，要等他們去電詢問。

這樣，我們只得等待他們去電問明原因，再商辦法。當時葉先生卻接下去談到關於生活書店的整個問題。他說生活書店事業發達，但總有一部分不肯公開，所以黨對他不

放心。我問他有什麽部分不肯公開，他說不出。他旣不知道有什麽部分不肯公開，何以武斷說；「總有一部分不肯公開」，可見他的話毫無事實根據。我告訴他說：生活書店光明磊落，沒有任何部分不可以公開，沒有任何部分不肯公開的。生活書店的人可以公開，經濟可以公開，他有何疑問儘管提出，必能給他以充分的答復。生活書店的出版物都是公開的，沒有祕密的，而且依照政府的法令，經過審查機關的審查，更有什麽不公開之可言？就是根據政府法令，在一九三九年四月以前出版的可免送審查，但我們的倉庫也是可以公開的，審查會或黨部如要察看，也可以隨時派人往各倉庫察看。這樣說來，生活書店還有什麽一部分不肯公開？

聽了我這一番說明之後，葉潘兩位先生都沒有話說。過了幾天，我再去聽回音，知道西安省黨部的回電已到，羅列四個罪狀：（一）售賣禁書；（二）爲某方作通訊機關；（三）店內同人有小組織，顯有政治訓練性質；（四）店內出版物誹謗陝西當局。其實這四個罪狀一個都不能成立。請先談禁書。

（一）國民黨領導下的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原來要各書業將所有已出版的書籍送審查通過後才准售賣，這種辦法無異强迫各書業立刻都關門大吉，引起全體書業的抗議，

才酌予變通，規定凡在一九三九年四月以前出版的書可無須審查，在此時以後出版的書必須將稿件送審查。全體書業都照此辦法，生活書店當然也沒有例外。依此規定，一九三九年四月出版的書，都是先將書稿送審查，得到審查證後，才付排印，生活書店也同樣辦理，原無禁書的問題發生。卽屬一九三九年四月以前出版的書，如果審查會根據政府所公佈的審查標準，發現有須禁止發行的理由，將禁書書名及出版處所通知書業同業公會，再由書業同業公會通知各同業，以便遵守，事屬兩便；檢查的時候亦應由統一的審查機關根據審查會的統一的標準及審查的結果，加以檢查，也可以免去不少不必要的糾紛。但事實卻不是如此。同屬於同一國民政府和同一國民黨領導下的各地圖書雜誌審查會，中央審查會通過的，各地方審查會可以加以否認，卽可認爲不能通過而視爲禁書；各地方審查會彼此之間也可以隨意否認，隨意卽指爲禁書！例如昆明通過的，桂林通不過；桂林通過的，中央通不過；中央通過的，桂林也可能通不過！生活書店出有一本書叫新生代，在桂林審查會通過後，印了五千册，費了許多工夫運到重慶，卻被中央審查會否認，作爲禁書全部沒收。你問他們同是根據中央所公佈的審查標準條例，爲什麼有這樣矛盾，使書業於遵照法令送審之後還要受到這樣毫無理由的損失，他們無辭以

管，但是他們隨意說是禁書就算是禁書，置交涉於不理。至於檢查書報的機關，更是五花八門，各自爲政，有圖書審查會，有公安局，有憲兵團，有臨時駐紮的部隊，有黨部，各機關有各自的「標準」，於是可以隨意指任何書報爲禁書。試舉一個尤其奇特的例子，生活書店出有一本蔣委員長的抗戰到底，是搜集蔣委員長許多領導抗戰的演講詞，而且都是公開在各報上陸續發表過的，不但經過內政部審查通過准許註册，而且還經過中央審查會審查通過，但是戰時首都的公安局卻隨意指爲禁書，捆載而去！我向有關各機關交涉，都承崇他們置之不理。內政部審查圖書，也是根據三民主義等等原則，但是審查會也隨意否認，指爲禁書，其他檢查機關也可以任意加以「禁書」罪名，這都已成爲司空見慣的事情。這本抗戰到底卻經過兩重的審查通過（內政部及審查會，）仍然完全失去法律保障，我們多方探詢之後，才知道因爲該書附錄裏載有中共響應蔣委員長的宣言，這宣言原是在各報上公開登載過的（報上文件也經過新聞檢查處的檢查，）原來頑固反動份子也各有其程度的差異，中央政府又未公佈過「頑固反動標準條例」，所以儘管是依法審查通過的圖書，只要頑固反動份子的特殊青睞，便隨時隨地可以失去依法的保障！

以上還是指一九三九年四月以後出版的書報而言，至於一九三九年四月以前出版的書報，依政府法令是可以無須送審的，那檢查機關更可以隨意指爲禁書。經過依法送審的書報，得到審查通過證，仍然不一定能夠得到依法的保障，遵照法令無須送審的書報（指一九三九年四月以前出版的，）那不能得到依法的保障，檢查機關可以隨時隨地任意誣陷，更不待言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西安黨部以售賣禁書爲罪狀而封店捕人，我們認爲是莫須有的罪狀。我們請中宣部電令西安黨部指明所謂禁書是什麽書，應即查明列舉呈報，結果是石沉大海，並無下文，所以我們斷定這一點是誣陷無疑的。而且即退一萬步說；果然售賣了禁書，出版法亦有明定的辦法，先須警告，警告無效，才加以罰款，亦不應遽而封店，捕人，甚至刦掠一空，現在西安黨辦的中國文化服務社分社的橱窗玻櫃，赫然就是以前西安生活書店分店所有的原物，這又是根據什麽法律，那一條法律的呢？

（二）我們店內出版物是專備本店同人看的，就是以前提過的店務通訊，我們細查歷期店訊，才知道所謂「誹謗陝西當局」者，僅僅是店訊中簡單提及有些書經過中央審查會通過而陝西黨部卻隨意指爲禁書爲不當，指示該地同事應本此意向陝西有關當局說

明或交涉而已。我們這種合法合理的在業務上對於本店同事的指示，何以能構成所謂「誹謗陝西當局」的罪狀！這種「罪狀」之爲莫須有，略有常識的人都能加以正確的判斷。因爲中央政府旣爲整個抗戰中國的中央政府，而不是僅在重慶一個地方的政府，它所公佈的審查標準條例，其內容是否適當是另一問題，旣經公佈，成爲法令，也可同樣通用於陝西，顯然是一種常識；一個商業機關的總店對於分店同事指出這種理由，作爲該地向有關當局說明或提出交涉，俾得解決困難，顯然也是一種常識。

（三）講到爲某方作通訊機關，據中宣部負責人的解釋，所謂「某方」者，是指與西安同在陝西的延安而言。延安在西安有公開的八路軍辦事處（即十八集團軍辦事處，在戰時首都重慶也有，）辦事處當然可以處理關於通訊的事務，根本就用不着別的機關越俎代庖。

不過談到此事，我要順便說明：爲讀者服務，是生活書店最寶貴的幾種傳統精神之一，是生活書店所以在十六七年中能由很小規模的週刊社（最初由我在內，正式職員只有二個半人！）突飛猛進，蓬蓬勃勃，發展到分店佈滿全國各重要地點達五十餘處，全體同事達四五百人之多，最主要的基本原因之一，簡單稱爲「服務精神！」我們把它視

爲生活書店最可寶貴的八種傳統精神之一。（一曰堅定，二曰虛心，三曰公正，四曰負責，五曰刻苦，六曰耐勞，七曰服務精神，八曰同志愛——指工作同志——以後當陸續說明，以介紹於國人。）

現在先談服務精神。生活週刊常說它自視是讀者的一個好朋友，這不是一句空話，必須在實踐上幫助讀者解決種種困難，凡是在自己力量內所能勉力辦到的事情，必須盡忠竭誠爲讀者辦到。生活的發源地是在交通上乃至精神食糧上，物質供應上佔全國而且同時也佔全世界最重要地點之一，生活最初就憑藉着這些優點爲海內外無數的讀者服務。因此我們在規模還很小的時候，和海內外的讀者信札往返就很繁多。我每天必須抽出一部分時間來閱看各處讀者來的數百封的來信，有的提出這個問題來商量，有的提出那個問題要調查；有的托買這件東西，有的托買那件東西；形形式式，極五花八門之觀。我們對每一封信都用赤誠來處理，只須在力量上能做得更週到更滿意一點，必要做到那樣的地步而後肯休，而後肯甘心。這種「服務精神」成爲集體的產物或遺產，而身體力行於不自知。我們往往忙得夜以繼日，汗流浹背，爲某一讀者辦成一件事，手軟脚酸，筋疲力盡，不但不以爲苦，且以能爲讀者有所盡力，在實際上做到「好朋友」，視

爲至樂。有時很瑣屑的事情，例如南洋羣島有讀者來信囑托我們配購幾尺什麼顏色的什麼布，有同事即在馬路上做巡閱使，奔走竟日，達到目的，欣然回來，其神氣就好像哥崙布發現了新大陸似的，和我談起始末，簡直手舞足蹈。布掛號寄出去，來信說顏色淡了一些，或深了一些，於是馬路巡閱使再出發，重新做起，做到既不淡了一些又不深了一些，只須能使購者心滿意足，馬路巡閱使因此餓了一頓，或兩條腿酸了一夜，在他只覺得是責無旁貸，仍然談笑言歡若無其事。

所以我曾說一句笑話，說在我們這個機關，不管從小弟弟到老大哥，每個人的這一顆心都是滾熱，在我們這裏面找不出一個半個冷血動物。

由於這種疲而不倦，勞而不厭的傻子似的「服務精神」——生活最可寶貴的傳統精神之一，生活的讀者也就把他視爲最可靠的最親愛的「好朋友。」…………

（本書是韜奮先生最後的未完成的遺著，這第三章也顯然還沒有完稿。按照他原來的計劃，第四章以後一定是要寫他在民國三十年春又一次被迫流亡。這一次他再度流亡到香港，又因太平洋戰爭爆發，他在民國三十年底化裝逃出香港，但是這時他已不可能重回重慶，只得被迫着繼續過流亡的生活，這本稿子就是在他流亡過程中在病中執筆的。當他執筆時，還沒有對自己的病絕望，但不料這由於顛沛流離的生活而造成的病竟然打斷了他的生命，使他連這本稿子都不能寫完！）

附錄

附錄

韜奮先生事略

韜奮先生姓鄒名恩潤，生於一八九五年，今年五十歲。祖籍江西餘江，生長在福州，一九二三年入上海南洋公學習電機工程，後轉學聖約翰大學習文科。家況貧寒，求學費用均由課餘兼職和賣文取得以自給。

聖約翰畢業後入上海華洋紗布交易所任英文祕書，一九二五年任中華職業教育社編輯，一九二六年起接編生活週刊。

「九一八」後先生在週刊上一面痛責當局的苟延妥協，不能卽時抗敵禦侮；一面表明週刊的立場，說週刊是以勞苦大衆的利益爲出發點。十一月間馬占山抗日衛國，先生卽號召全國捐款輸將，一呼而得十二萬元，接着發動募款援助東北義勇軍。「一二八」時又爲十九路軍捐款及徵募軍需用品，並創立「生活傷兵醫院」。

先生深知週刊壽命不長，早在一九三二年一手撫育了一個「生活書店」，作爲服務進步文化事業的中心，果然一九三三年十二月週刊遭當局密令封閉。先生是一位勇敢善戰堅强不屈的文化戰士，當週刊被封後，再接再厲的發起創辦「新生」「大衆生活」「永生」「生活星期刊」「抗戰」三日刊及

「全民抗戰」，皖南事變後，「大衆生活」又在香港復刊，前仆後繼，始終沒有間斷。

「一二八」那年，先生與戈公振、胡愈之等發起號召讀者集資創辦「生活日報」，一呼而收集資金十六萬元，後亦被迫停刊。一九三六年二月，正式在香港創辦「生活日報」，發行了五十四天，又遭停閉。

一九三二年先生參加蔡元培、宋慶齡諸先生所發起的「民權保障同盟」，當選爲執委。同年六月楊杏佛被刺，先生也名列「黑單」，不得已於七月間流亡海外，游歷美英和蘇聯以及歐洲其他七個國家，歷時二年多，於一九三五年六月歸國，寫了「萍蹤寄語」和「萍蹤憶語」兩書。

回國時正值敵人魔爪深入我華北各省，他立即號召全國，主張開放民衆運動，停止內戰，組織民族聯合戰綫，實行抗日。十二月十八日上海各界救國會成立，先生被推爲執委，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一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於上海，又被推爲全救執委，七月間與沈鈞儒、陶行知、章乃器先生等聯名發表「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主張團結一致對外，十一月廿二日深夜先生忽與其他救國會領袖在上海被捕，十二月四日轉移蘇州高等法院，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方獲自由，在看守所裏寫了「經歷」和「讀書偶譯」兩書。

「八一三」後先生日夜從事於抗戰工作，十月間離滬去漢。一九三八年六月間，先生以救國會主要領導人之一的資格被聘爲國民參政員，從這時起到一九四○年的一年半間，先生中心工作爲「加强全國團結」和「爭取民主」的鬥爭，主張（一）立即結束訓政，開始憲政，實行無限制的普選制度；

（二）開放民衆運動，允許民衆團體合法存在；（三）保障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四）承認各抗日黨派的合法存在；（五）立即撤消圖書雜誌原稿審查辦法；（六）立即停止一切特務活動，保障人民身體之自由；（七）立即釋放愛國政治犯；（八）在抗戰期內憲政開始之前，各黨派先行參政，並羅致全國無黨無派人士組織舉國一致的國防政府。

一九三九年七月，先生在重慶熱烈發動組織重慶各界憲政座談會，作公開演講，並聯合各黨派發起組織憲政促進會籌備會。

一九三九年四月起，生活書店西安分店忽被國民黨黨部查封，同人被捕，到一九四一年二月止，五十六個分支店陸續被封，只留一個重慶分店。被捕同人達四十三人，至今還有二人未釋，一人被慘殺。一九三九年八月間，國民黨中央派潘公展、劉百閔兩氏要求生活書店與正中書局獨立出版社合併，並要求參加資金，指派總編輯和要求先生加入國民黨，這一切都被先生嚴詞拒絕了。

一九四一年一月間，皖南事變發生，二月先生憤然辭去國民參政員職，出走香港。到港後一面從事反抗國民黨獨裁，促進民主的鬥爭，一面展開海外僑胞間的文化工作，曾寫成長篇史料「抗戰以來」連載在「華商報」又為「保衛中國同盟」英文半月刊按期撰寫論文，十月間與救國會留港代表九人聯名發表「我們對於國事的主張」，同時促成「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

十二月八日太平洋烽火突起，先生由港在難民群中潛赴東江抗日民主根據地，他這時始踏進了祖國的自由地區。但重慶國民黨政府則密令「就地懲辦」，發動特務人員嚴密監視與搜索先生的行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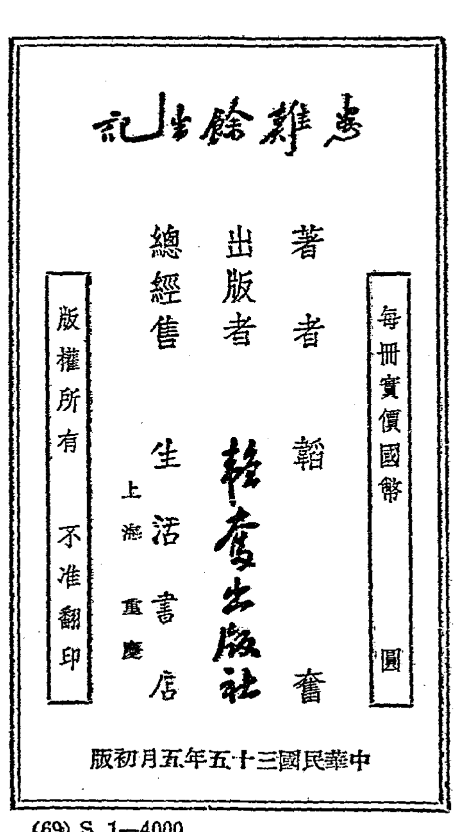
先生仍不獲自由。在鄉間住了八個月，於一九四二年十月才輾轉到達華中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

先生患腦癌疾起於一九四二年八九月間，迫於環境，不能立即治療。在一九四三年二月間病勢稍輕時，又寫了「患難餘生記」五萬字，并有寫「蘇北觀感錄」和「各國民主政治運動史」的計劃，可惜「患難餘生記」未及寫完，先生就不能執筆了。

先生原在蘇北解放區養病，後因病勢日趨嚴重，到上海就醫，六月八日深夜三時先生忽然暈厥數分鐘，當即召集最接近的朋友，預囑了後事處置，以及對政治時局等的意見。七月廿一日驟發高熱，廿四日早上七時廿分停止呼吸。彌留時還關懷祖國，惓念同胞，呼籲全國堅持團結抗戰，實行民主政治，建設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

韜奮先生重要譯著

書名	年份
韜奮漫筆（雜感集）	一九三一年著
革命文豪高爾基（傳記）	一九三三年編譯
萍踪寄語（初，二，三集）	一九三四年著
萍踪憶語	一九三七年著
經歷（自傳）	一九三七年著
大衆集（論文集）	一九三六年著
坦白集（論文集）	一九三七年著
展望（論文集）	一九三七年著
再厲集（論文集）	一九三八年著
曙光集（論文集）	一九三九年著
讀書偶譯	一九三七年著
蘇聯的民主（英　斯隆原著）	一九三九年著
從美國看到世界	一九三九年譯
事業管理與職業修養	一九四〇年著
抗戰以來	一九四一年著
患難餘生記（最後遺著）	一九四三年著



患難餘生記

每冊實價國幣　　圓

著者　韜奮

出版者　韜奮出版社

總經售　生活書店　上海　重慶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初版

(69) S. 1—4000